

華強 著

《夏小正》 新考證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

《夏小正》新考證

華 强 著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夏小正》新考證 / 華強著. --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7-5337-7825-5

I. ①夏… II. ①華… III. ①古歷法-研究-中國
IV. ①P194. 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006358 號

XIAXIAOZHENG XIN KAOZHENG

《夏小正》新考證

華強 著

出版人: 丁凌雲 選題策劃: 葉兆愷 責任編輯: 葉兆愷 張楚武

責任印制: 廖小青 封面設計: 馮勁

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 <http://www.ahstp.net>

(合肥市政務文化新區翡翠路 1118 號出版傳媒廣場, 郵編: 230071)

電話: (0551)63533330

印制: 合肥創新印務有限公司 電話: (0551)64321190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商聯系調換)

開本: 880×1230 1/32 印張: 5.25 字數: 100 千

版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7-7825-5

定價: 30.00 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序

中國現存的這兩本最古老的文獻《山海經》和《夏小正》都是夏朝勞動人民創造，並且以口口相傳的方式一代又一代保下來的，因為夏朝以前還只有口語，沒有系統的文字，少數文字被鑄刻在玉器上被保存下來，玉是最好的文字載體之一。

經過後世學者不斷的收集、整理、補充，這兩本珍貴的經典被完好地保存到今天。由於它們產生的時代的局限性和地域的局限性，今天當我們深入研究這兩本夏代經典時，難度是相當大的。

首先他們的創作是在一個只有方言，只有口語，沒有官話，沒有統一普通話的時代，所以他們都是用幾千年前夏的口語方言寫成的，故此今天的研究者在研究中也必須用夏的口語方言去閱讀。方言涉及整個音系，而口語涉及意義的表達。

這兩本書當時的口語方言流行於環巢湖地區，上溯到九江兩岸，南抵長江，北至黃河南岸。

今天文獻還在，口語還在，方言變化不大，兩書有越來越多的人看懂了。兩書流行地域也沒有大的變化。但是我們必須有緊迫感和危機感：保存口語，捍衛方言。在目前，保存各種方言已經是在保護一種稀缺資源。



大約五千年前，中國夏代是一個沒有漢文字系統和權威官話系統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人們全憑記憶和敘述來傳播文化。

今天當我們研究夏早期也是中華民族的初期文化遺產，諸如《夏小正》和《山海經》這樣的遠古檔案時，我們必須設身處地深入那個古老的時代。

目 錄

《詩經·豳風·七月》是夏、周曆法轉型說的歷史文獻.....	1
《夏小正》的歷史背景	12
《夏小正》的天文和曆法	14
夏方言的分佈情況解析	29
一、【正月】	40
二、【二月】	70
三、【三月】	86
四、【四月】	98
五、【五月】	105
六、【六月】	115
七、【七月】	118
八、【八月】	125
九、【九月】	136
十、【十月】	144
十一、【十一月】	150
十二、【十二月】	154
參考文獻	159

《詩經·豳風·七月》是夏、周曆法 轉型說的歷史文獻

在先秦文獻的《詩經》中，《豳風·七月》是一篇西周人用來記錄夏曆法向周曆法轉型的歷史檔案，也是迄今為止我們研究夏周曆法轉型時唯一的歷史檔案。遺憾的是，在既往的《詩經》研究中，學者們大多側重進行橫向對比研究，或認定該詩所處的西周早期同時實行著夏的十月制太陽曆法和西周的十二月太陰曆法，或認定《豳風》是周公旦所作，或認定它是“描繪了三千年前奴隸的生活”。總之，周人的《豳風·七月》和夏人的《夏小正》一樣，被研究者視作是某一個時代的農書，分別用來記錄夏朝和西周氏族的天象、物候和農事。例如，傅斯年就將《豳風·七月》定義為“封建制下農民之歲歌”。但是如果是一首歲歌，為什麼選擇了《豳風·七月》作為標題和開篇呢？它的標題為什麼不是《豳風·一月》呢？因為七月開始大地的生物徵候分歧十分明顯。造成這種分歧的本質是太陽歷和太陰歷的不同。

夏商的曆法轉型分別只用了一年時間，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這是中國遠古一個非常偉大的文化工程。

然而我在深化的閱讀中却發現《豳風·七月》一詩的最重大的史料價值不在夏周兩種曆法的時代共存；不在作者可能是周公旦；不在它記錄了三千年前普通農民的生活。而在於《豳風·七月》一詩記錄的正是夏的十



月太陽曆法轉換為西周的十二月太陰曆法這一歷史事件本身以及具體轉換的方式方法，這是最重要也是最彌足珍貴的歷史史料。事實上據今本《竹書紀年》記載：大禹登基伊始便“頒夏時於邦國”，《禮記·禮運》載孔子在找到《夏小正》時欣然“吾得夏時焉”。在《豳風·七月》中保存了諸多貌似不符合曆法規律的原始的自我矛盾之處更為難得：

其一，全詩月份記載次序雖紊亂，但却有著一條清晰的主綫。其基本時間順序主綫保存了夏曆的一月直至十月，然後是周曆“一之日”直到“四之日”，此後又復回歸到農曆三月的習慣表達：“春日”或“蠶月”。雖然按照這個順序部分月份多有省略，但是全詩中這一條月份時間主綫基本不變。按照全詩八個段落的展開次序，我們可以列出這樣一條條時間綫索：

- ①七月、九月、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
- ②七月、九月、春日（新年三月）；
- ③七月、八月、蠶月（新年三月）；
- ④四月、五月、八月、十月、一之日、二之日；
- ⑤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改歲（進入新的一年）；
- ⑥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 ⑦九月、十月、人執宮功；
- ⑧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九月、十月、春節（進入新的一年）。

這樣夏曆一年時間的 10 個月就排列為：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每個月週期爲 36 天。

這樣西周的周曆兩年時間中增加了四個月（即四個“某之日”），這 24 個月就排列爲：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春日（或稱蠶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一之日、二之日……，每個月週期爲 30 天。

過渡兩代的曆法分別用去了 360 天，剩下的 5 天是過年或者說是慶祝豐收的狂歡節。我們可以從《詩經·豳風·七月》一詩的結尾看到這一節日的記載。

孔廣森等學者認定，正月是夏正建寅之月。但是把時間依照夏曆的十月曆法倒退一年，則正是夏正的建子之月。很多曆法都存在一個從十月太陽曆向十二月太陰曆轉變的過程。（請參看筆者的《“詩經·七月”西周初期獨特的曆法現象》）

正月只是指每年的第一個月，正如正音指的是朝廷使用的主流方言。三代的曆法各不相同，所以正月的位置也就不同。夏的正月和如今的農曆一樣定於孟春一月初一開始，俗稱夏正建寅，其實這個建寅是上一年的寅月。在曆法改革中，十月改爲十二月，所以新的一年從建寅開始。周的正月定於如今農曆十一月初一開始，俗稱周正建子。秦正建亥，就是說秦的正月是今天農曆十月初一。這就是遠古史上著名的“三正”。須注意的是“三正”之“三”是指夏周秦，而不是夏商周。

請注意夏曆的建寅是怎樣形成的？當夏曆從每年只有十個月轉化為一年十二個月時，多出的正是子月和丑月。新年的寅月即是正月也是建寅之月。《詩經·七月》里周朝人採用的是另一種方法，即在十月之後加了四個月：一之日（十一月）、二之日（十二月）、三之日（正月）和四之日（二月）。

但是有兩個觀念必須撥亂反正的，一是夏王統治中原時實行的是十月太陽曆法，所以每個月是36天。這一點在《夏小正》中通過養日和養夜之間相隔五個月及其餘諸多星象的週期就可以看到，一年中出現這樣的現象，只能是每個月三十六天。周以後改為十二個月的太陰曆法，每個月三十天。從十月曆法到十二月曆法的轉換是需要技巧的。所以《史記·曆書》有：“夏正以正月，周正以十一月，……秦正以十一月。”二是兩個至日（當時並不稱冬至和夏至）是每個季節的第一天，夏至是夏季（孟夏）第一天，冬至是冬季（孟冬）的第一天。當今之上半年的夏至一般是每月第五第六天。下半年的冬至一般是每個月的第七第八天。這說明我國農業的二十四節氣是逐漸形成并固定下來的。至少在夏代是沒有這二十四節氣的。《漢書·律歷志》載：“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朔旦就是第一個早晨之意。《尚書大傳》載：“夏（代）以日至六十日為正（月）。”這就是夏的十月曆法向周的十二月曆法過渡的具體原理：將一到十月的每個月由三十六天縮到三十天，這樣全年就多出來六十天，正好是新曆法（周曆）的十一月和十二月。當

一年過去時，第十三個月恰好是新的一年開始（正月）。於是從舊的十月曆法的一年平滑轉入十二月周曆的新的一年。從而完成了向周曆法的轉制。這個轉變在《詩經·豳風·七月》一詩中有詳細記載。詩中凡一月二月等便是夏曆十個月的稱呼，一之日二之日便是過渡期周曆的新稱呼。長期以來，一些學者對這個說法並不認可，但是如果夏代不是十月曆法，則文中有很多的內容就無法解釋。首先解釋不了的就是“啓蟄”。

這樣，西周人利用兩年時間就順利地從夏曆的十月曆法轉化為西周曆的十二月曆法。

清末皮錫瑞《經學通論》說：“此詩言月者皆夏正。言一、二、三、四之日者皆周正，改其名不改其實”。這條時間主綫說明當時的西周正處於夏朝的十月舊曆法向西周的十二月新曆法的歷史過渡時期。很多的學者堅持認為《豳風·七月》的夏曆和周曆在很久一個歷史時期是共存現象。我認為儘管月份有一些混亂，但是西周氏族採用的十月舊曆法應該是繼承了夏氏族的曆法制度，而西周的十二月新曆法制度也正是從夏的十月曆法演變而來，而《豳風·七月》正是記錄這一曆法的歷史演變的重要文獻。這正是《國語》和《禮記》里都提到的“夏之衰也，周棄繼之”的一個例證。我認為這一過渡的原因是此時人們已經發現堯舜禹時期所採用的十月曆法的太陽曆存在著誤區。而通過人們長期對月亮運行規律的觀察和總結，制定并推出了新的周曆的十二月曆法制度。

夏的十月曆法文獻依據目前可資借鑒的是《山海經》裏的十個太陽說，每年東方的太陽直射南回歸綫是北半球的冬至；太陽直射北回歸綫時是北半球的夏至。這一點可資證明堯舜禹時期確實曾使用過十月曆法。但是十月曆法的最大缺陷是月亮大約 30 天圓缺一次，也就是每年的月亮一共圓缺十二次——即十二個月。山西陶寺考古也證明唐堯時代的十等分的觀象臺是用來觀察太陽運行規律的。西周的十二月曆法則是依據月亮圓缺一次的週期為農曆的一個月，週期為 30 天。西周人選擇了冬至所在的這一個月（即數九）作為一年的開始——冬至一般在農曆每年的農曆十一月，即西周曆法的一月，亦即本詩中的“一之日”。從字面上理解，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和四之日就是日之一、日之二、日之三和日之四的意思，這是西周曆法增加的四個月。西周的立法者為什麼要在十月之後增加這四個月呢？本詩又為什麼在諸多的月份中選擇了《豳風·七月》作為標題呢？

首先請記住：夏曆是沒有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夏曆每年只有十個月，所以每個月有 36 天，年終有一個節日。所以一年的時間跨度是 365 天。周曆每年也是 365 天，但是由於每年增加了兩個月，因此每個月只有 30 天。

大約一直到春秋戰國時代我國各地都流行著夏曆、殷曆和周曆三種不同的曆法，三者最主要的區別在於歲首（即農曆的一月，秦避始皇嬴政的名諱改稱正月）的不

同，所以又稱“三正”。周曆以通常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即農曆的十一月）為歲首，殷曆以建丑之月（即農曆的十二月）為歲首，夏曆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即後世流傳使用至今的農曆正月）。周曆比殷曆早一個月，比夏曆早兩個月。“三正”歲首所在的月份不同，對應的四季也有差別。由於西周和夏的特殊親緣關係，西周在實行周曆之前使用的是夏的十月曆法。由於夏曆只有十個月，所以推測只能有春秋兩季，這是用《春秋》做為史書名的依據。

其二，《豳風·七月》的上述時間主綫採用了三種記錄月份的方式：一種是保留了夏氏族使用的一月到十月的“外殼”。這種方法的令人不解之處是沒有十一月和十二月，也沒有如殷商甲骨文的十二月甚至十四月的記載。但是有一點提請讀者予以特別關注的是這裏的一月到十月如果是按照夏制就是每月 36 天；按照周制就是每個月 30 天。本詩《豳風·七月》一月到十月的內含是每月 30 天，也就是夏曆已經轉化為周曆，太陽曆已經轉化為太陰曆。這是夏曆和周曆轉化的關鍵。另一種是周曆，周曆已經改定曆法為每個月 30 天。這樣夏曆的十個月每個月多出 6 天，兩年中就多出來 120 天，這 120 天恰好在每兩年之間增加四個月：即在兩年之間增加了周曆的“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和“四之日”，對應的就是後來農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和二月。夏曆改周曆，一年中的天數沒有大變動，依然是 360 天 + 5 天，但是夏曆的每年十個月變為周曆每年十二個月。這

樣在兩年之間增加了四個月的曆法改動對農事的影響最小。尤其是上半年的一月到六月(農曆),即詩中所記錄的三之日、四之日、蠶月、四月、五月、六月對應的天象、物候、農事基本不受影響。這一改變使西周的曆法與月亮運行週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就兩種曆法的轉變而言,這一種改變最小。

夏曆向西周曆的轉變每年的時間仍是 365 天不變,由於在兩年時間內增加了四個月。爲了區別上年的三月和新年的三月,詩中在“四之日”以後,新的一年的三月用夏曆三月的舊稱“春日”或者“蠶月”來代替,這樣就完成了從夏的十月曆法向西周的十二月曆法的順利轉換。在民間要推廣和轉換兩種曆法,并讓百姓自覺接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轉變不順利就有可能耽誤農時。《豳風·七月》正是以百姓耳熟能詳的民歌形式使周曆這一新曆法深入人心、家喻戶曉。我認爲《豳風·七月》正是記載了夏和西周兩種曆法轉換的歷史事實以及轉換的方法。

兩種曆法中的某月和某之日并不是對應的:本詩的具體對應是:“一之日”(即周曆一月)對應的是農曆十一月,“二之日”(即周曆二月)對應的是農曆十二月,“三之日”(即周曆三月)對應農曆一月,“四之日”(即周曆四月)則對應農曆的二月。按照這個對應規律,位於“四之日”之後的農曆三月(即周曆五月)在詩中按照夏人的表達習慣表示爲“春日”或“蠶月”。當然它也可以按照周人的表達習慣叫做“五之日”。

其三,《豳風·七月》全詩的結尾也很耐人尋味:在“九月肅霜,十月滌場”之後出現了這樣五句詩:“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這樣五句詩應該是發生在幾月里,在詩中并無時間定語的限制。因為它緊隨“十月滌場”之後(十月是夏曆的習慣提法),可以理解為周氏族的男人們在豐收之後的狂歡。所以,這五句既可以置於“十月滌場”之後作為一年中獨立的豐收節日,如果此時西周尚未實行十二月曆法,也可以理解為西周人年終的狂歡節(猶如今天的春節)。

無獨有偶,全詩的第五段是:“五月斯蠡動股,六月莎雞振翅。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又是一年的歲終,又是五句詩,又是缺少時間定語限制,這一轉換稱為“改歲”,婦女和老幼開始“貓冬”。如果說新的一年從這裏開始,那麼夏採用的確實是十月的曆法制度。而西周的新年同樣可以從這裏開始,因為夏曆的十月底正是西周曆的十二月底。夏曆和西周曆都在這裏“改歲”。由此夏曆和西周曆順利地完成了轉換。

依照上述的遠古記載,夏人和西周人都曾經過十月曆法的實行,因為他們在十月底(夏曆)開始野獸冬眠式的“貓冬”,并“改歲”進入新的一年,按《豳風·七月》記載,夏的十月底,是周的十二月底有一個豐收之後的狂歡節。後來西周對夏的“太陽曆”進行了改革。而具體

的改革方法就是將每月 36 天改爲每月 30 天，十個月里多出的 60 天，就是新增加的十一月和十二月，西周人稱之爲“一之日”和“二之日”。從《豳風·七月》一詩可以看到，夏周時期進行“冬眠”式休閒的只是兩代的老人和婦孺。因爲青壯年的男人們整個冬天仍在忙碌：

“一之日於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豸，獻豸於公。……二之日鑿冰衝衝，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其四，這裏就引出了又一個問題：如果當時西周實行的是十二月曆法，那麼十月滌場之後的豐收狂歡顯然時間上不倫不類。然而西周的曆法是十二月曆法，這一點在《豳風·七月》中已經有明確的記載。例如“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但是同一詩篇中記載十月曆法的又有“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這說明西周的豳地（或許還包括秦地的部分地區）在這一時期確實并存著兩種曆法。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西周正處於一個曆法的轉型期。此前各國均實行的是夏的太陽曆。《豳風·七月》正是這一曆法轉型的歷史文獻。如果是周氏族的狂歡，爲什麼是選擇在十月之後，而不是在年終的十二月之後，即本詩所說的“二之日”？從全詩結構看，上述五句作爲全詩結尾，顯然認爲十月是一個終結，要麼是一年的終結；要麼是種植季的結束。所以西周人選擇了

冬至所在的農曆十一月是對夏文化和歷史的繼承。

其五，為什麼本詩冠名《邶風·七月》：從新發現的清華簡看，我國從春秋開始具有遠見的文人們就有收集整理記錄保存遠古口傳文獻的做法，這種做法最早可以從歷史文獻中追尋到孔子所整理的夏代的古籍《夏小正》。

《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比較《邶風·七月》和《夏小正》我們可以發現，兩者之間對一年中的前六個月的天象、物候、農事基本沒有變化。參見三秦出版社2005年黃懷信等《大戴禮記彙校集注》用這種轉換方案，夏的一到五月底恰好和西周的六月底天數重合，都是180天。因此七月無論天象、物候還是農事開始都表現出鮮明的西周曆法的月份特點。最為典型的就是詩中所反復吟唱的“七月流火”：

火又叫大火或者商星，天文學上指的是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它在每年的農曆六月出現在正南方的天穹最高處。進入農曆七月便開始逐漸西下，古文獻中把這種現象叫做“流”。詩中的西周七月正是夏曆的六月，無論是夏曆還是西周曆上都是下半年的開始，也是夏曆和西周曆的天象、物候和農事開始出現分道揚鑣的起點。也就是說，西周曆七月以前和夏曆一樣，但是西周曆七月以後一切都變了，天象和月份的對應，物候和月份的對應，尤其是農事和月份的對應，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夏小正》的歷史背景

《夏小正》在春秋時代被孔子在今河南杞縣的古杞國發現。此前的《夏小正》在夏裔民間以口傳形式傳播了很多年。其實春秋之時很多的文獻都是以口傳形式流傳在民間的，這與幾千年來的農業諺語的流傳路徑相像。殷商甲骨文的“占”字的形體是一張實心的口正對一張空心的口傳授知識。這實心的口代表懂得知識的人，而空心的口代表的是學習知識的人。這個意思大致也是口口傳播的本義。總之，春秋及其后的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中的很多文獻資料都是通過採風整理後得到的。與《夏小正》類似的還有西周的文獻《禮記·月令》、《詩經》中的《豳風·七月》、漢代的《淮南子》中的《時則訓》以及《呂氏春秋》中的月令記載等。說明民間類似口傳文獻是很多的。此外民間尚有參照《月令》題材撰寫的農業文獻《四民月令》，等等。這充分說明早在孔子之前，竹簡、羊皮等書面載體流傳下來的文獻是很少的，民間以口傳方式一代接一代地記述流傳著文獻。原因很簡單：當時還沒有書面載體，或石槐、玉石、竹簡等少見的文字載體。

孔子是目前歷史上發現的第一個採風、搜集、編纂上古文獻的學者，對拯救先秦諸子百家的口語文獻有筆路藍縷之功，這也是孔子永垂青史的原因之一。孔子在

其晚年開始修訂六經：《詩經》《尚書》《禮記》《樂經》《周易》和《春秋》。孔子還試圖編寫修訂《夏禮》，但是在夏人集中居住的杞國遍尋不得，偶然發現了夏的後人們口傳的農俗之書《夏小正》。《史記·夏本紀》中記載：“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這恰能說明孔子生活的時代正是我國開始收集整理口傳文獻時期，而孔子正是位列諸子之首。

所以我們可以說：孔子是中國先秦採風的第一人；而孔子編纂的《夏小正》理所當然地就是中國第一書。

《夏小正》全書很短，不同的版本大約只有三百到四百字左右。但仔細閱讀《夏小正》的內容，我們會發現很多歷史遺留的問題等待我們去逐一解決。

《夏小正》的天文和曆法

《夏小正·七月》原文(以下簡稱《七月原文》):七月。莠藿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蘋。爽死。苜莠。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

筆者之所以選擇《七月》入手研究夏的曆法,是因為《七月》集中了《夏小正》中比例最大的天文氣象內容。

孔廣森曰:七月“此章經文凡十一事:莠藿葦,一也。狸子肇肆,二也。湟潦生蘋,三也。爽死,四也。苜莠,五也。漢案戶,六也。寒蟬鳴,七也。初昏織女正東鄉,八也。時有霖雨,九也。灌荼,十也。斗柄縣在下則旦,十一也。

當我們細心閱讀上述七月原文時,會發現所述的十一件事的次序在時間上是混亂的。這說明在最初的民間搜集整理時,就是來自口傳過程的。也就是說,在搜集和編纂《夏小正》的過程中,次序變亂了:第四件開始“爽死(氣象)。苜莠(物候)。漢案戶(天文)。寒蟬鳴(物候)。初昏織女正東鄉(天文)有霖雨(氣象)。灌荼(物候)。斗柄縣在下則旦(天文)。”

《夏小正·七月》涉及氣象變化的首先是從“爽死”開始的。《詩經·豳風·七月》有“九月肅霜”,學者將肅霜多解釋為天高氣爽。筆者認為其實“爽死”和“肅霜”

都是指開始起霜了的物候。“爽死”音訓爲夏口語“霜起”，“死(sǐ)”是夏方言，其音訓爲“起(cǐ)”，而“肅霜”本義爲讀書音“嚴霜”之意。兩詞本義相通，兩者的差別在於夏曆的七月已經是周曆的九月。除“苒莠五也”、“寒蟬鳴七也”外，《夏小正·七月》自第四到第十一件事幾乎都涉及天文和氣候。爲什麼七月的天文和氣候所佔比例較大呢？除了氣候本身的原因以外，編纂者對天文和氣候的編輯整理也是產生混亂的原因之一。我們來看《夏小正·十一月》和《夏小正·十二月》，兩個月通篇不見一個字涉及天文和氣象，通篇也鮮見對農業生產的記載。如果說對農業和天文、氣象的記載很少，這兩節內容却又有冬季狩獵的記載。對此可以有兩點推測：其一是這兩個月的內容在整理編輯中改動較大。其二可能原先就沒有《夏小正·十一月》和《夏小正·十二月》兩節。因爲夏曆的曆法是一年只有十個月，而商周的曆法是一年十二個月。所以《夏小正·十一月》和《夏小正·十二月》兩節是在口口相傳中後補的內容。同樣的內容還出現在周代的《禮記·月令》和《詩經·豳風·七月》中，可供大家參考。十一、十二月的狩獵內容印證了夏代的農耕和幾無狩獵。

現在讓我們回到《夏小正·七月》中的“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鄉”。（作者補注：初昏，牛郎正西鄉）、“時有霖雨”、“斗柄縣在下則旦”，這相關的四條都是和天文氣象有關的。在同一本書中天文氣象知識同樣分佈的很不均勻，說明這本書可能在搜集原始材料時尊重

了原始口傳素材，但是在整理編纂過程中對天文部分的內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動。這個根本性的改動就是將遠古十月制的夏曆與十二月制的周曆——作了對應的編排。

應該說《夏小正》最早是憑藉口口相傳而世代流傳的。因為是農事曆書，僥倖躲過了秦火一劫。但是它却没能躲過后世文人的刀筆篡改。所以我說春秋之前的每一本遠古文獻都有在口傳過程中的一個不斷地再加工甚至是添油加醋的傳播過程。《夏小正》應該是夏代的農事曆書。它的文字極其簡樸、艱澀、深奧，所以古來為其作訓釋者頗多，爭議也頗多。尤其是該書中被後人篡改的地方較多，使得這篇極其簡單的文字看上去疑竇叢生。這正是許多遠古文獻被無端攻擊為偽書的歷史原因。

《夏小正》的口口相傳的歷史至少持續了兩千年以上。先秦諸子的很多文獻都是經歷了類似的口口相傳的歷史。

目前流行的《夏小正》一書的內容按照周曆分成十二個月，主要涉及三個方面：①天文氣象；②物候；③農事（含冬季狩獵）。在這個範圍以外的記載應該都可以看作是後人羈入的內容，例如十一月和十二月兩節中的全部內容。尤其值得強調的是《夏小正》全書並不涉及任何一個個人或者官吏。但是它却將人本身的生理變化作為物候納入了書中。這就是“八月……丹鳥羞白鳥”。這句內容由於最早的隱晦的口傳，歷幾千年的流

傳雖原文未變，但古往今來的專家學者們的校注可以說是幾乎沒有正解，令人吃驚的是他們的考證和實際物候竟是毫不沾邊，彼此大相徑庭。

在炎黃二帝統治中原時期，我國勞動人民就已經具備了對日月星辰的系統定位，對其運行規律已有極為深刻的了解。這一點遠古文獻不乏真實詳盡的記載。試舉幾例：

《左傳·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文中有兩處需要說明：一是商丘應爲帝丘，帝丘即帝嚳的大本營，在今河南的濮陽，帝嚳和帝顓頊都安葬在濮陽城外。二是帝嚳的二兒子成爲了唐人的首領，就是說帝堯的氏族劃歸了帝嚳的二兒子實沈領導下。

類似有關遠古天文的古文字的實例也有很多，例如甲骨文中有一個字，一個老人圓睜雙眼向上看著星空，有古文字學家將其破譯爲“堯”字。甲骨文中還有一個表示日暈的“暈”字。（參見拙著《殷商甲骨文本訓》）

山西臨汾陶寺的觀象臺的發現恰好證明夏的十月曆法，因爲用來觀察太陽光影的石柱是十一根，而不是十三根。十一根石柱之間只有十個空隙；十三個石柱之間才會有十二個空隙。同樣在這一遺址的王者大墓中還發現了觀察太陽使用的玉戚和有刻度的長尺。

筆者在認真研究了《夏小正》之後，得出一個結論：

夏代的一年中應該只有十個月，且每個月有三十六天。這樣一年是 360 天，結餘的五天是豐收以後的“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的過年或者說是狂歡節，也就是王室宴請男性勞動者的五日狂歡，這也是春節放假五日的最古老的歷史依據。

最科學的證據是書中“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養日”又叫“永日”，“養夜”又叫“永夜”，分別是一年中 longest 的白天和黑夜，也就是現在農曆的夏至日和冬至日。從古到今，這兩個日子是不會改變的。夏至日和冬至日之間正好相隔約半年時間，而《夏小正》中的夏至日和冬至日只相隔五個整月。這是夏時一年只有十個月的鐵證。如果你仔細分析一下《夏小正》的物候和農事，就會發現《大戴禮記》所傳《夏小正》中，十一月和十二月的記載極其簡單且沒有有關農事的記載。其中的十一、十二月內容極少，以致令人生疑：

“十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

“十二月：鳴弋。元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麋角。”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夏曆的夏至到冬至是五個月時間；而冬至到翌年的夏至却是七個月時間的間隔。筆者認為上段所引的《夏小正》原文的內容共三十二個字是夏朝以後的文本，歷代學者或是因為不知道夏代十月曆法的史實而羈入，或者是別有目的而羈入。前一種羈入的可能性較大，因為不理解而誤以為《夏小正》十個月內容是缺了兩個月，所以自作聰明地補齊了

全書。同時農曆的十一月和十二月沒有天象和農業的記載，僅僅有關於“納卯蒜”的模糊記載。這也是不符合《夏小正》的記敘體例的。如果夏朝確實是十月曆法，那麼《夏小正》的原文就應該是只有十個月的天文星象。如果有人將這種十月曆法誤認為是少了兩個月，有心補齊這兩個月的學者必然精通天文和星象。筆者的理由如下：

所謂物候是指與天象、氣候有關的生物周期性節律性的現象。在《夏小正》中，應該是每個月獨有的物候現象。上述“隕麋角”顯然不具物候的季節典型性。麋鹿隕角現象每年冬天前後可以持續四個月之久。對於十一月、十二月連續出現“隕麋角”，現代學者何新感到頗不理解。其實在生物學上，麋鹿隕角並不是按月出現的物候，即使在一月、二月出現也是正常現象。但是《夏小正》這樣的農事曆書中就不應該有這樣模糊的物候記載。但那時的社會文明顯然沒有進步若此。

此外，和前十個月相比較，“王狩，陳筋革。……納卯蒜。”（直譯為：帝王冬狩，陳列秋季製造，并展示業已定型的筋革類的兵器……向王室進貢卯蒜。（卯蒜也叫獨蒜，特點是一個蒜頭只有一個球形的獨蒜。）在書中很少提到王室的活動（兩次，另一次算不上活動，“王始裘”，即使是像“鹿人從”這樣持續兩個月的物候，也是集中在夏曆八月），此前十個月的內容均是記載民間生活。也就是“大正”和“小正”的區別。

第三，《禮記》有記載，嗇人和虞人都是地方官吏，全

書也僅是在十一月、十二月裏兩次提及。鑒於上面的三點，《夏小正》中十一月、十二月的大部分内容均與前十個月内容和體例上反差都太大。顯然在孔子正夏時之前，在漫長的民間口傳過程中，被篡入的可能性很大。當然《夏小正》的內容混亂和邏輯混亂絕不僅限於此。筆者將在全文考證中一一予以澄清。

換一個角度看，前面十個月已經從天象、物候、農事三個方面詳細記載了夏曆全年的農事，十一月、十二月的內容就明顯是贅筆。筆者這樣說是因為後兩個月的記載內容是獨立的有關狩獵的記載。這部分内容可能來自有狩獵傳統的殷商的口傳曆史。

從天象看，十一月十二月獨無天象記載。而前十個月的記載表明：

“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

二月：斗柄縣在下……

三月：參則伏。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

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鄉。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辰則伏。……參中則旦。

九月：辰繫於日。

十月：初昏，南門見。織女正北鄉，則旦。”

按照《夏小正》的記載，在夏曆的一到十月中，星象

完成了周天 360 度的旋轉，所謂年初起於玄枵，年末復止於玄枵也。因為十個月里行走周天，所以每個月運行接近 36 度。通過簡單的計算就可以知道每月的天數是 36 天。十月曆法這點已經由天文學家所證實。這一點已經得到山西臨汾陶寺考古的證實。詳情參見何新《〈楚帛書〉與〈夏小正〉新考》所引。

出現以上錯誤的最大可能性是在搜集、整理《夏小正》時，搜集編纂的文人看到的只能是夏曆的十個月的版本。由於考證編纂者不知道夏是十個月曆法，就依據當時的史料自作聰明地補齊了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內容。但是這一版本的考證編纂者不懂天文星象，所以將“時有養日”和“時有養夜”分別保留在五月和十月。

因此筆者認為，《夏小正》的前五個月的內容可以相信是真實的，但是六月份的內容就值得懷疑了。因為《夏小正》的編纂者既然可以增加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內容，就必然會將五月的部分內容改在六月。而且整個下半年的很多內容都會出現諸如此類的編纂錯誤。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來對比一下十月曆法的夏曆和十二月曆法的周曆：

因為夏的一年祇有十個月，所以《夏小正》中的物候和農事和《禮記·月令》裏每年十二個月的物候與農時就有了前后的不一致。下表列出了農曆和夏曆十個月的對應關係，為了對比物候和時間的方便，筆者同時列出了二十四節氣和夏曆的關係以幫助讀者理解，但是讀者務必要了解夏代是沒有二十四節氣的，但夏代人的細

心觀察使得他們在 4000 多年前就從天文星象上看出了節氣的奧秘。

夏曆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半年結束
農曆	正. 1~ 2. 6	2. 7~ 3. 12	3. 13~ 4. 18	4. 19~ 5. 24	5. 25~ 6. 30
節氣	立春雨水 驚蟄	春分清明	穀雨立夏	小滿芒種 (夏至)	夏至小暑 大暑
夏曆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一年結束
農曆	7. 1~ 8. 6	8. 7~ 9. 12	9. 13~ 10. 18	10. 19~ 11. 24	11. 25~ 12. 30
節氣	立秋處暑 白露	秋分寒露	霜降立冬	小雪大雪	冬至小寒 大寒

上表中夏曆十個月每月為 36 天。每年的年底即夏曆十月的最后一天是農曆的臘月三十。按照夏曆的計算，一年是 360 天。但是我們知道農曆的一年是 353 天或者 354 天，所以農曆每隔數年就會多出一個閏月。但是依據《詩經·豳風·七月》的記載，這多餘的五天在西周可能是一個慶祝豐收和過年的狂歡節。

根據上表，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我們結合《夏小正》的內容可以做這樣的理解和當代節氣不同的是，現代節氣總結的是規律性的自然界和一個節氣中各種物候天象，而《夏小正》在遠古一個物候、一個星象，甚至最常見的人類性生活的細節也加以關注，不予放過。

夏曆正月：“啓蟄……魚陟負冰。……農緯厥耒……聞有見韭……田鼠出……農率均田……斗柄縣在

下……雞桴粥(通鷓鴣)”都可以在正月看見。其中還有一句“梅杏柰^①桃則華。”梅是正月初,杏和桃分別在月中和月底開花。由於《夏小正》正月底的驚蟄時間相當於《禮記·月令》二月初,所以《禮記·月令》雖然在正月有“蟄蟲始振”的記載,而在《禮記·月令》二月里又有“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而出”的記載。從物象看,二月的這次記載比較符合驚蟄這一節氣的特點。但是重複的物候記載使傳、疏、注的學者們就用心良苦了。

夏曆二月:“來降。燕乃睇……有鳴倉庚……”均爲節氣性物候。

夏曆三月:“攝桑。菱楊……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拂桐芭……鳴鳩”也都合了節氣。

夏曆四月:“囿有見杏……王萑秀……取茶(採茶)”在自然界可見。但是夏時採茶比我們今天明前茶、穀雨茶都遲一些,味道就要苦一些。所以夏時的茶又叫苦茶。安徽省茶區每年這個時候銷往北方的黃大茶便是。

夏曆的夏至按照農曆看正是在夏至日左右,所以有可能在夏曆四月也可能在夏曆的五月。從日期上看出現在夏曆四月的幾率比五月多得多。但是因爲夏至日前后每天的白天都很長,無法精確到具體哪一天,所以《夏小正》說的模糊而不確定:“時有養日……時有養夜”。而冬至則出現在夏曆的十月初。以下不再每個月依次舉例。夏至和冬至正好時隔五個月,是夏曆的半

^① 柰:通“柰”。參見《大戴禮記》p183,三秦出版社,2005。

差距。到《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臘月)和夏曆十月正好在相同的時間結束。我們用物候充分證明《夏小正》和《禮記·月令》在曆法上是同步的,而絕非一先一后。

《禮記·月令》每年 360 天,每月 30 天,每年結餘 5 天,作為春節(狂歡節)。

《夏小正》每年也是 360 天,每月 36 天,每年結餘 5 天,作為春節(狂歡節)。

春節過後,從正月初一開始,它們各自開始了新的一年,這絕不是偶然巧合。很多物候的答案后來被總結歸納在現代以太陽黃經基礎上的現代二十四節氣中。

甲骨文字作為夏以后歷史的一個佐證,也能够間接證明夏代實施的是十月曆法,并且祇有春秋兩季而不是春夏秋冬四季。因為在夏代結束三百年以後,殷商出現的甲骨文字系統中祇有“春”、“秋”、“冬”三個季節的用字。其中的“冬”的本義并不作冬季解釋,“冬”作為“終”的初文和本字,其本義筆者已經考證出來,即“冬的本義:終端。名詞。用如動詞:終結,結束。引申義:最後。”甲骨文中未見的“夏”字始見於金文(秦公簋),筆者認為該字的本義是“夏桀被肢解”的會意,其本義也不是夏季的意思,而應讀作 xià。因此,在甲骨文中用於表示季節的字祇有兩個:“春”和“秋”。這一點有力地證明在晚商時代仍然不存在四季的分法,而是只有春秋兩季。這就難怪春秋時代的孔子要用《春秋》作為一部歷史書的名稱了。

在《詩經·邶風·七月》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兩種

曆法的轉換記載。這正是一月到十月的夏曆和“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的周代十二月曆法實施的萌芽狀態。說明這一時期正是夏曆的十月曆法和周曆的十二月曆法的轉換時期。這份歷史檔案是異常珍貴的。

既然是十月曆法，半年就應該祇有五個月。一個季度是不存在兩個半月之說的。這是從反面證明夏代十月曆法的存在。同時也能夠有力地證明夏代是沒有四季之分的。這大約就是孔子的《春秋》一書名稱的由來吧。

最後還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就是《詩經·豳風·七月》雖然是周代民歌，但是全篇十個月的曆法分成兩種曆法制度：一種是一月直到十月的夏代曆法制度；另一種是“一之日”直到“四之日”的周代的曆法制度。《詩經·豳風·七月》正是記述這兩種制度之間的轉換過渡的。前一種曆法是夏的曆法，後一種曆法是先周的曆法。筆者這樣說是基於詩歌中物候、農事、星象三者和月份的對應相比較得出的結論。該詩凡提及月份的總是夏曆在先，周曆在後，連標題也是採用了七月的夏曆形式。全詩祇有結尾部分爲了烘托年終狂歡氣氛用了“九月肅霜，十月滌場”的夏曆形式。

要剖析《七月》中夏周曆法的過渡無需進行全詩比較，我們只要將其中夏曆的九月和十月的物候、農事、星象和對應的月份作一番比較即可。把相關的月份節選如下：



“九月授衣”、“十月隕籜”、“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九月叔苴”、“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即同，上入職宮功”、“九月肅霜，十月滌場”。

我們會發現詩歌中所記敘的九月的物候、農事和星象實際是現實中十一月的；而十月的物候、農事和星象實際是現實中十二月的。例如隕籜（即落葉）應在立冬之後；塞向墐戶一定是在人們貓冬之前；改歲（即跨歲過年）必然是在十二月底以後。類似的現象在上面的《夏小正》中也已經做了部分的探討。此處《詩經·豳風·七月》作爲一個輔證。有關例證我們在《夏小正》的後續考證中還將繼續論述。例如《七月》中的“九月肅霜，十月滌場”中的“十月滌場”，在《夏小正》里是歸入在正月農事之中的。讀者可以用同樣的方法考證“某之日”的周代曆法的形成，這一曆法很好記憶，“一之日”就是周曆一月，在夏曆是十一月；“二之日”就是周曆二月，在夏曆是十二月。依此類推，“三之日”和“四之日”是周曆的三月和四月，對應的夏曆則是一月和二月。

夏方言的分佈情況解析

《夏小正》是漢字出現之前，在夏代百姓口頭上流傳的一部農曆文獻。它最早的文字版本是春秋時孔子搜集、整理并編纂成書的。《夏小正》的口語流傳的歷史過程遠在孔子成書之前，採集、整理和編纂成書之前應該是流傳在大禹治水之前，那個只有口語而尚未有系統文字的漫長的歷史時代。從《夏小正》記載的內容看，當時農耕方式已經普及。在文字形成系統之初，並沒有人想到將其編纂成書，直到孔子到杞國進行夏禮採風時才發現了它。而杞是西周以後分封給夏的後裔的領地。從此以後，先秦的諸子百家的很多文獻都陸續發現并編纂成書。例如《淮南子》《呂氏春秋》以及諸子百家的許多搶救性發掘、記載的著作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

所以如果現代的學者要研究遠古漢語的語音，筆者建議他們不要沉迷在清朝的小學家們的窠臼里。清朝小學家們的古音研究是標準的顧頡剛式的層纍式研究，從清朝學術研究的當下開始，沿著歷史的主綫倒推向遠古。但是當語音倒推到了《切韻》之前就遇到了大麻煩。在《切韻》成書之前除了各地氏族的方言以外，是沒有標準的通用官話的。《切韻》的發音是當時的讀書音，也就是邵榮芬所說的雜湊音。夏朝的內方方言、外方方言

(雅言)、商代藉以創造甲骨文字音訓的以大邑商爲地理中心的商代的方言、以夏朝雅言爲基礎的西周官話，實際上統統都是各自爲陣的地方方言或者其他氏族方言。這些地方方言在《切韻》一書中表現爲糅合多邦方言語音的混合方言形式。從時間上看，它的語音材料是公元601年雜燴形成的洛陽方言。《切韻》成書時距離口傳《夏小正》的時代至少已經過去了2600年。夏代氏族方言或者說地方方言，和《切韻》之間有一條深深的漢字發音的鴻溝。這些氏族之間的漢字發音，已歷經各朝各代方言或正音之間的新的融合，應該是怎樣的發音呢。這個過程中一定有兩大強勢方言：一是當代帝王的家鄉的方言，二是在朝廷占主流的地方方言。《切韻》之前是氏族或者地方的也是較爲純潔的方言；各種氏族方言或者地方方言相對獨立；而《切韻》之後是朝廷流行的官話，即南北朝時北魏名臣李沖所說的“帝之所居，即爲正音”。這種正音是朝廷官員操持的各種方言的混合物，其中帝王的家鄉方言起著主導和核心作用。

清朝學者王念孫在研究《廣雅》之後提出了一個觀點：《廣雅》之訓，多本方言。《廣雅疏證》一書便是王氏潛心研究《廣雅》的訓詁學所得。以揚雄的《方言》爲代表的遠古方言音韻和《切韻》爲代表的中國古代音韻的正統源流之間也是上述的漢字發音的深深鴻溝。清朝的諸多小學大家，早就在音訓研究中創造了後世顧頡剛的“歷史層纒法”，從清代一路推向遠古中國，但是當他們上溯到了《切韻》音系時，同樣遇到了這種無情的語音

斷層。中國遠古音韻研究遇到的最大的難題正是這個斷層：遠古氏族獨立的方言，夏王朝的兼容各種方言的雅言（雅言實際上是一種最早的朝廷官方流行的口語），《切韻》的讀書音。雖然這三種口語在音訓理論上其進化的路徑是遞進的，但是《切韻》保留了官方語言系統的最早的文字記載。

許多學者認為方言的發音是不斷進化的，這個結論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些學者認為方言語音的變化會隨著語音進化的歷史進程產生質變，因此今天的地方方言不能用來研究遠古的漢字發音。筆者認為方言具有極強的保守性，在一個封閉的地理環境里，如果沒有外來強勢文化的影響，方言一般將保持自己的發音系統。有夏一朝的語音按照嵩山為界，嵩山以南為內方方言，操持這種方言的是夏裔的內方人，這種發音是他們的祖先從黨河流域和黑河流域遷徙到內方時帶來的。嵩山以北則為外方方言。這是大禹建立夏王朝時在不同方言交融中形成的官方語言。這種外方方言因為外氏族方言的混入兼容了不同的氏族方言和地方方言。這是有文獻可查的。“禹會萬國”，必然以諸多方言的順暢交流為前提。也就是說大禹王之時雅言——外方方言——已經流行。這種流行僅局限在嵩山以北地區，這個地區叫做三邨，是夏王朝的京畿^①。

《史記》：“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

① 華強，《甲骨文比較研究：夏之京畿——三邨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湯遂伐三桀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商人所說的“三桀”就是夏京畿“三鄆”兩字的音訓。那是一個只有方言的時代，即使是夏商王朝的官方所謂正音，發音本身也是方言。^①

夏、商人用以創造甲骨文的夏、商方言的語音至今也依然有蹤跡可尋。比起2600年以前的洛陽語音雜燴，比起六朝古都的南京方言雜燴，比起北宋南北語音混雜所產生的“新杭州口語”，各地的方言語音其實變化并不大。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之前許多地處偏遠山區和環境閉塞的鄉間，保留了極為珍貴、原始、真實的方言語音。家庭和村落是保存方言的基本單元，這些遠古的氏族方言，繼而進化為當時的地方方言，就是我們今天各地方言的基礎。兩者之間是有內在聯繫的，兩者之間的傳承關係也是有規可循的。

一個朝代的正音，並不取決國都的大小，或者國都人口的多少，或者外來語音勢力的強弱，而是取決於那個朝代的統治者的意志。“元魏孝文時，禁其種人用代語（即禁用鮮卑語）。李沖曰：‘九州之音，竟知誰是？帝之所居，即為正音’。”^②歷史上，洛陽話、杭州話、南京話都曾經是當時朝廷的正音。新中國成立之後，普通話被規定為正音。其實在遠古的大禹為夏王時，內方話和雅言也曾經是夏王朝的兩種正音。其中的內方的方言至

① 《史記》，夏王室稱之為三鄆。

② 黃侃，文字聲韻訓詁筆記，（p14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今依然流行在湖北的丹江口以南遠古稱之內方的地區，河南的南部除了宛西四縣之外的大別山地區也很好地保留了這種方言。至於有夏一代的雅言實際上正是夏朝廷官方御用的“正音雜燴”，今天可以在安徽省的環巢湖地區找到它們之間歷史的繼承。內方方言和外方的雅言是以嵩山南北來界定的：嵩山爲一東西走向的山脉，以山脊上的路將嵩山分爲南麓和北麓。嵩山以南稱內方；嵩山以北稱外方（即上述的三鄴地區）。所以嵩山北麓還有另一個別名叫做外方山，和內方山相提并論。

夏代的文獻至今還保留基本完好的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雙璧——《夏小正》和《山海經》，或者我們可以將它們稱爲中華文化的奠基石。研究夏代漢字的發音就只能建立在這兩本書的基礎上，這才是中華語音的根，這才是夏文化的根，這才是中華文化的根。研究中國遠古的語音只能從這兩本書開始，而不是從清朝小學的專著向《說文解字》和《切韻》去倒推式的尋找。這種研究犯了方向性的錯誤，這種研究的方法也是錯誤的。讓我們回到《夏小正》和《山海經》，就目前而言，這兩本書才是中國文化史和中華語音史的起點。

《夏小正》語言上的第一大特點是存在大量的口語化的同音假借字。爲什麼會這樣？因爲初創這兩本書的時代文字還太少。這一特點顯然是口語時代的遺存。據此我們可以判定《夏小正》口傳版本完成的下限是在夏代早期甚至更早，所以它是中華文明最早的文獻之一。《夏小正》既然是夏代以前的口傳的文獻，它就應該

是相當於今天湖北東部的漢江直至嵩山以南的河南南部的內方話，即夏氏族口語發音，繼而發展為嵩山以北黃河以南的外方方言發音，夏稱雅言。既然是夏代的口語文獻，那麼如果它是用夏代口語流傳的韻文，其韻腳部分很可能由魯人孔子這樣的編纂者而產生諸多變形。另一個例證是《詩經》，其中的十五國風 305 首西周前後的詩歌口語、聲調和韻腳一定是各有特點的。好在我們先行研究了《夏小正》。因為《夏小正》並不押韻，故魯人孔子的整理不會給韻腳帶來大的變動。所以我們基本可以肯定《夏小正》的發音應該是夏代前後夏氏族的方言發音，且極有可能是以農業和蠶桑業為主的時代內方方言的發音。這對於我們研究考證夏代方言和語音是非常重要的。這就引出《夏小正》成書後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很多發音的字并非本字，而是同音假借字。一個根本的原因是《夏小正》的成書年代是在口語年代，雖有漢字，但是數量遠遠不夠使用者的需要。正是因為遠古時期流傳下來的只有口語的聲音和意義，在搜集整理時使用的文字有很多是同音假借字。春秋戰國時期的類似的很多文獻都有這樣的語音現象。夏代的方言至今依然存在。筆者認為這些方言并非如某些學者所說已經無迹可尋或者變化太大。可能我們過於輕視了方言的頑強的生命力和保守力量，它們的保守性使得它們的發音在幾千年裏並無太大的變化。但是在不斷開放的社會中，方言的變化一定是有的，這就向我們的語言文字工作者和學者們提出了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搶救

我們的方言，尤其是搶救我們今天依然深藏在某些偏僻地區的方言。這項應由國家來領導的方言搶救運動，現在却淪落為一些學者們的業餘愛好。如果中國的方言全部或者部分地“絕種”了，那將是中華民族莫大的損失，也是世界文化的莫大損失。

《夏小正》一書中的同音假借字，諸如“雁北鄉”“滌凍塗”“鞠則見”“雞桴粥”“爽死”“剝棗栗(零)”“元駒賁”“鳴弋”“則穴(夏方言)”“越，有小旱”“越，有大旱”“採識”，等等。研究之初不搞清楚這些音訓，就無法找到它的原始的出處和本訓所在。這也恰恰是譯注本書的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夏小正》在語言上的第二個特點是證明了夏代語言發音中反切的存在。《夏小正》中有一個迄今為止專家學者們都沒有解決的難題。夏八月的原文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丹鳥羞白鳥”，至今未有達詁，已經做出的音訓考證基本是錯的。也就是說幾千年來專家學者對它的考證注疏和訓詁學解釋無一正確，千古懸疑。愛好此道的學者和愛好者不妨循著筆者的啟發，初步嘗試一下這五個字的達詁。我想以往的學者們將其解釋為蚊子也好，螢火蟲也罷，都不足以記載在中華第一曆書中的。那麼，這五個字究竟怎樣解釋才貼合實際呢？且待本書後面對它的破解。

當口語的語音逐漸成熟以後，人們才開始造字，反切字是造字早期的創造。因為口語時代的發音是沒有本字的，文字初創時期文字數目也是遠遠不夠的。所以

有些音節的發音需要通過兩個字的反切才能記錄下準確的發音，有些音節發音的長度不夠，只好用兩個字的重複來湊足音值的長度。例如《山海經·南山經》的堂庭之山、猿翼之山、柰陽之山、青邱之山，等等。在標注發音的同時也標注了音調（音長）。

可以想見，孔子採風時記錄的是文字的發音，所以他只能用同音假借字來記錄《夏小正》的原文。此時漢字的文字（本字）系統已經成熟，即對應於每一個本義已經有了固定的語音表達；對應的每一個本義不僅在發音上有一整套的語音系統，同時對應的還有一整套的文字記錄。而當時的文字的載體已經由夏的玉版甲骨、商的青銅器，發展到了竹、木簡冊。

比較一下幾乎同一時代的《夏小正》和《山海經》，兩者使用的反切尋常可見，只是《山海經》中的反切字的比例稍大一些。這一點可以證明，《夏小正》要早於《山海經》的誕生。

《夏小正》在語言上的第三個特點是簡潔，或者說是一種不成熟。全書據何新統計有400余字。其實《大戴禮記》的《夏小正》正文中已經包含了部分的戴德的傳，所以實際上的《夏小正》總字數要更少一些。這是其一；《夏小正》中凡屬於正文的句子極少有超過六個字的。大多數語句只有二三個字，這是其二；因為在文獻中每一句的漢字數已經不能再少，所以這一本《夏小正》是漢字文獻中最為簡潔的作品。最短的句子只有兩個字：一個是動詞，一個是名詞。例如：攝桑，季楊。這是其三。

這種簡潔表明了文字發展過程中都必然經歷一個不成熟的階段。有一句甚至只有一個字：零。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尋找出鯀禹時期夏人的大致遷徙脈絡，這對我們考證《夏小正》非常有幫助：

1) 中原的鯀禹氏族是由西部昆崙山附近的都廣之野遷居而來。其主要原因是人口超生。鯀禹氏族之所以竭力治水，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宜居土地，而治水是得到宜居土地最快捷、最經濟的方法。大禹出生地見揚雄《蜀王本紀》和《山海經》為證。

2) 鯀禹氏族的遷徙路線首先是沿著漢江向東南到了今丹江口以南的內方地區，具體地說就是武當山、桐柏山和大洪山之間的一方宜居土地。這塊土地的正東是桐柏山和大別山，正北是長江，江西的 800 里幕阜山隔江而望，正西方向是雲夢澤，而正南是他們離鄉背井遷徙的來路——漢江上游。郢縣以下有多處夏代考古遺址為證。

3) 需要補充一點的是：長江以南的幕阜山之南，遠古時居住著三苗族。三苗族和鯀禹氏族是同一個大氏族的瓜蔓氏族，所以他們常常渡過長江騷擾和搶劫內方的鯀禹氏族。後來，不堪其擾的虞舜命大禹將三苗氏族遷往敦煌附近的都廣之野。

4) 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新的遷徙大軍，繼續向東南遷徙。他們大致分成兩支遷徙大軍。一支從桐柏山和大別山北麓的通道進入今河南南部，另一支沿長江進入今安徽的長江兩岸。長江的環巢湖一帶早在 5000～

8000 年之前就有人居住。凌家灘遺址位於安徽省含山縣銅閘鎮凌家灘自然村，是距今 5300～5500 年規模較大的新石器晚期的聚落遺址，總面積 160 萬平方米。是有巢氏的祖上，也是大禹氏族的祖上。以夏人的方言（內方方言）交流。

5) 說夏人的方言的人群主要是從內方進入了河南南陽和大別山北麓，向東一直到固始、光山一帶。

6) 鯀禹氏族很快就在嵩山的南麓紮下根來。這支大軍被堯、舜委以重任，就是治水中原。

《竹書紀年》：“（帝堯）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國語·周語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鯀。”韋昭注：“崇，鯀國。伯，爵也。”

7) 大禹治水前和益了解中原的山水分佈，“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爲此，堯將自己的居住地讓給了大禹氏族。於是夏縣的東下馮地區成爲夏人治理黃河的根據地和後勤補給基地。堯國遷往霍太山南麓的汾河兩岸。夏文化從此日漸走向強勢。夏文化的標誌性時段是大禹治水，而夏文化的真正的崛起則是禹會萬國和《禹貢》。

8) 禹登基，居陽城；啓即位於夏邑。此後有夏一朝一直活動在上面七條限定的地理範圍內，直至夏桀。《古文竹書紀年》云：“湯遂滅夏，桀逃南巢氏。”於是我們可以初步界定夏王朝的方言區可以劃分爲：東起大別山東界延伸到固始、光山一綫；南到長江；西界爲雲夢澤至武當山丹江口；北至晉南的東下馮。這一方言區又可以

細分爲兩塊：嵩山以南到大別山的方言區，從漢江向南到長江的方言區，這兩個方言區方言基本可以互通，而且說的是嵩南的夏方言；嵩山以北直到黃河南河之間的洛水、泚水、黃河這個三江流域是夏王室的主要活動區域，所以他們說的是夏朝廷使用的雅言。環巢湖在商湯滅夏前使用的也是夏方言，隨著夏桀流亡帶去的強勢雅言，成爲一種夏方言和雅言融合的方言。夏王室使用雅言的地區，《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中提到的那三條可資證明，茲抄錄於下：

(1)《逸周書·度邑解》“武王曰：‘……自洛汭延於伊汭，據易（通“陽”，陽城也。作者注）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涂，我北望過於有岳，鄙顧瞻過於河，宛瞻於伊洛，無遠天室。’”

(2)《戰國策·魏策一》：“吳起對曰：‘……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溪之陽，廬率在其北，洛伊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

(3)《國語·周語上》：“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

一、【正月】

本月經文共記載了二十一件事。啓蟄一也；雁北鄉二也；雉震响三也；魚陟負冰四也；農緯其耒，初歲祭耒五也；圃有見韭六也；時有俊風七也；寒日滌，凍塗八也；田鼠出九也；農率均田十也；獺祭魚十一也；鷹則爲鳩十二也；農及雪澤十三也；初服於公田十四也；採芸十五也；鞠則見十六也；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十七也；柳稊十八也；梅杏棗桃則華十九也；緹縞二十也；雞桴粥二十一也。

正，本訓讀作 zhèng。秦代避秦始皇名諱正讀作 zhēng。但是上古音沒有舌上音，故在上古音和一些方言中發音爲齒頭音 zēng 或 zēn。正月，孔廣森等學者認定，是夏正建寅之月也，但是把時間依照夏曆的十月曆法倒退一年，則正是上年夏正的建子之月。很多曆法都存在一個從十月太陽曆向十二月太陰曆轉變的過程。（參看筆者的《“詩經·七月”西周初期獨特的曆法現象》）

【夏小正考證】正月只是指每年的第一個月，正如正音指的是朝廷使用的主流方言。三代的曆法各不相同，所以正月的位置也就不同。夏的正月和今天的農曆一樣定於孟春一月初一開始，俗稱夏正建寅。周的正月

定於今天農曆十一月初一開始，俗稱周正建子。秦曆建亥，就是說秦的正月是今天農曆十月初一。這就是遠古史上著名的三正。注意三正是夏周秦，而不是夏商周。

但是有兩個觀念必須撥亂反正的，一是夏王統治中原先實行的是十月太陽曆法，所以每個月是36天。這一點在《夏小正》中通過養日和養夜之間相隔五個月及其諸多星象的週期就可以看到，一年中出現這樣的現象只能是每個月三十六天。周以後改為十二個月的太陰曆法，每個月三十天。從十月曆法到十二月曆法的轉換是需要技巧的。所以《史記·曆書》有：“夏正以正月，周正以十一月，……秦正以十一月。”二是兩個至日（當時並不稱冬至和夏至）是每個季節的第一天，夏至是夏季（孟夏）第一天，冬至是冬季（孟冬）的第一天。這說明我國農業的二十四節氣是逐漸形成并固定下來的。至少在夏代是沒有這二十四節氣的。《漢書·律曆志》載：“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朔旦就是第一個早晨之意。《尚書大傳》載：“夏（代）以日至六十日為正（月）。”這就是夏的十月曆法向十二月曆法過渡的具體方法：將一到十月的每個月由三十六天縮短至三十天，這樣就多出來六十天，正好是新曆法的十一月和十二月。這樣當一年過去時，第十三個月恰好是新的一年開始（正月）。於是從舊的十月曆法的一年平滑轉入十二月新曆法的新的一年。從而完成了曆法的轉制兩種。這個轉變在《詩經·豳風·七月》一詩中有詳細記載。詩中凡“一月”“二月”等便是夏曆十個月的稱呼，“一之

日”“二之日”便是過渡期周曆的新稱呼。長期以來，一些學者對這個說法並不認可，但是如果夏代不是十月曆法，則文中有很多的內容就更無法解釋。首先就解釋不了的就是啓蟄。然本書既有正月一說，則已然是秦代之后的成書了。

【夏小正原文】啓蟄。

《大戴禮記傳》：言始發蟄也。《禮記·月令》說：“孟春蟄蟲始振，仲春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這是一個從夏代口傳《夏小正》延續下來的錯誤。意思是孟春時節（正月），土壤中的蟄蟲開始被春雷震醒，但是這些蟄蟲并未全部從冬眠蘇醒，而是繼續蟄居在上穴中。仲春（二月）這些蟄蟲都出上了。“啓戶”之“啓”字的甲骨文的，字形就是一只手正在開啓門戶（本義就是開門）。

啓蟄在正月，驚蟄却在二月。西漢末劉歆乾脆將驚蟄改爲了二月的節氣。如果兩者是同一個節氣，爲什麼《夏小正》啓蟄在正月，而劉歆將驚蟄劃在二月呢？《後漢書注》引蔡邕《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據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這個回答忽視了還有第三種可能，就是當一個月是 36 天的情況下，有可能出現這 36 天中連續出現三個節氣，這三個節氣分別出現在月初、月中和月尾。由於每個月的天數多達 36 天，所以物候星象多有變化。注意：按照當時的節氣劃分是沒有雨水這一節氣的。這說明我國上古時文化現象

的形成是有一個歷史的過程的。從嶄露頭角經過揚棄再到逐漸穩定並走向成熟，最終成爲一種定型的文化現象。

《左傳》中記載孟春之月天子要祭祀天地，叫做“啓蟄而郊”，意思是蟄蟲出土以後，天子就可以進行郊祭了。有學者質疑這個郊祭應該在仲春二月，這個質疑是有依據的，因爲按照三十日的周曆法，“啓蟄而郊”的天子郊祭日應該是在二月的初五或者初六。

【夏小正考證】啓蟄是不是今天的驚蟄節氣？從上述的蔡邕的《月令章句》看應該是同一個節氣。治《夏小正》的學者們沒有看到這個問題的實質：其實啓蟄就是後來的驚蟄，兩個節氣雖然名稱有差別，本質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一月的啓蟄和二月的驚蟄爲什麼會有兩說呢？這是由於《夏小正》的口傳版本完成於較早的十月夏曆法時期，每個月有三十六天。當時的節氣並沒有二十四個，這一文化現象還沒有發展成熟。後世的學者用二十四節氣去硬套，必然無法自圓其說。既然雙至可以是每個月的第一天（朔旦），則啓蟄（驚蟄）在孟春或仲春應該不難理解。

《夏小正》時夏曆爲每年十個月的太陽曆，這一點已經由山西陶寺的考古所證實。陶寺的觀象臺有 11 根石柱，其間隔就是十個，觀察太陽時是每月一格。他們的“啓蟄”在孟春之月，且可以在正月的下半月，或者二月的上半月。原因就在當時並未規定每個月必須有兩個或者三個節氣。而每年蟄蟲的出土恰恰在每年的一月

底二月初，蟄蟲的啓蟄（或驚蟄）延續一個時段，所以夏的正月三十六天，改為十二月曆法後，一月多出六天。周的二月的前六天是正月順延，兩者都涵蓋了這一時段——蟄蟲蘇醒并出土的時段。這說明夏人的曆法有一個從每月三十六天改為每月三十天的變化，相對應的每月節氣數，節氣位置，以及代表每月節氣的典型天象和物候，都有逐漸確立和系統化的過程。

但是驚蟄的科學性是無可置疑的，驚蟄應該是春天里蟄蟲蘇醒的日子，就是說自驚蟄開始，蟄蟲們從冬天裏紛紛醒來，於是開始啓戶而出了。這個日子就是今天公曆每年的二月初五或初六。在夏代，它曾經是正月下半月的某一天。

至於這個節氣，夏人稱呼為“啓蟄”，夏朝的三鄆地區以及後來的洛陽人稱之為“驚蟄”，是有原因的。“啓蟄”和“驚蟄”屬於不同民族的方言。從發音上看“啓 qǐ”和“驚 jīng”的聲母 q 和 j 發音部位相同，遠古至今都是塞擦音。q 母和 j 母在上古是同一個聲母，經歷了分化的過程，分化為 q 母字和 j 母字。最后分化為後鼻音 jīng。

【夏小正原文】鴈北鄉。

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尚書疏》）

此章經文凡二十二事。……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

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

【夏小正考證】這裏提請大家注意，在《大戴禮記彙校集注》中，注明：“震”、“响”二字戴校本互易，即原文有可能是“雉响震”。到底誰才是正解呢？大戴的傳是說野雞聽見雷聲就會拍打翅膀，同時發出响鳴。“响”字在《說文》口部中查不到，須從隹部查它的通假字雉字。

《說文》：“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句其頸。從隹句，句亦聲。”段注：古侯切。許慎的這個解釋是對的。就是當正月雷聲初鳴，雄雉便開始响鳴，雄雉打鳴的時候像公雞一樣雙翼抖動而且句其脖頸。所以《集注》中的戴校本是對的。“雉响震”：雄雉响鳴時鼓動著翅膀，像雄雞打鳴一樣挺著脖子。也就是四川方言中“雄起”的意思。凡是看見河豚鼓氣發聲的讀者一定懂得這一點。

但是戴德說“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是否有科學依據似乎牽強。戴德說正月里打雷，人的耳朵聽不見，而只有野雞的耳朵才可以聽見，所以雄雉打鳴，是因為它聽見了雷聲。那麼試想：正月以後的大大小的雷聲總會繼續，人的耳朵爲什麼又可以聽見了呢？野雞爲什麼也聽見了？

《夏小正》是按照每個月的時間順序記錄農事的。上文的啓蟄很清楚是蟄蟲出土，也就是今天驚蟄的時間。但這裏的雉响震就很難確定它的時間定位。所以這一歷史時期的農業的驚蟄這個節氣顯然理論是不成

河面堅冰的消融。但《夏小正》中只是籠統地說河面的合冰起於南風，河面的解冰也是終於南風的。雖然冬季和開春時刮南風這個現象違反了氣象規律，關鍵在於這個結論該怎樣理解呢？這兩次南風帶來的都是最寒冷的氣候：封河和解凍。

本書的考證已然漸入佳境了。冬季的結冰封河好理解，因為它前面的季節秋季就是颱風季。對於夏代的中原而言，颱風是來自東南沿海（即八卦之巽象，故可以稱之為巽風，音通俊風）。但是，說“解冰必於南風”就比較費解了。但是為什麼《夏小正》和傳疏又都將其歸結於南風呢？這是文人學者從文字到文字的生吞活剝所致：“時有俊風”，就是東南方不時地有大風降臨的意思。有暖風便導致升溫和解凍。

研究《山海經》一書，我們發現舜和俊用於人名時是指同一個人。舜和俊兩個字在遠古是同音字，舜、巽、俊三個字也是同音字。巽字在夏的內方方言中讀作 xùn。由於舜和巽是同音字，俊風和巽風就被統一理解為南風了。其實準確地說，巽在八卦中的方位是東南向，所以這裏的巽和俊的南風應該準確地定位為東南風，也就是每年颱風襲來的方向。這是遠古之人簡單記憶全年季風次序的方法，即：颱風（東南）——結冰（北風）——解冰（北風或東南風）——颱風（東南風）。俊風應該是東南風的意思，不能做南風解。颱風當然是大風，大到了遠古人們難以抗拒的程度。《山海經》中有一些關於季風的記載。



家成群結隊地去均田。《爾雅》：“均，易也”。孟子曰：“易其田疇。”所以“均田”就是交換田地的意思。《夏小正》此記載說明均田制早在夏朝就已經開始，但是不是井田制，還需要有歷史文獻或考古的實證。《公羊傳·宣十五年》（公元前812年）何休注：“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按照我國先秦文獻的習慣提法，聖人制井田中的聖人一般指的是夏以前的三皇五帝之類。既是聖人定制，則按照上古文獻應該是早於夏甚至更早於黃帝時期就有此制度的。也就是說在上古的夏周時代男子娶妻即可按照當時的規定定數以授田。

傳疏中的“始除田也”，意謂農人開始均田，或者說開始換田易宅而耕之。所以選定此時，是因為節氣已經到了開始“除田”之時。《廣雅·釋詁》：“均田者，始除田也。”也就是正月已經到了除草耕田的時節了。

關於井田制，楊寬先生多有研究。但是《夏小正》涉及的是夏以前的均田，而楊先生研究的是西周及其後的井田制，所以這裏不再展開。兩個朝代的均田不同之處在於：夏的均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但并不像西周開始的井田制那樣規範^①。

^①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農及雪澤”即“農汲雪澤”，就是農民將雪澤之自然雪水汲出送往田地。這種浸泡猶如給田地施了一次肥料。遠古之人雖然沒有搞清楚雪水當肥的道理，但是他們原始的自然觀引導他們按照自然界的規律去種植穀物。雪水是上帝所賜且有益植物生長的。

《大戴禮記》注釋中所“言雪澤之無高下”也是一個模糊的解釋，像“滌凍塗”一樣也是一個不科學的考證。其中的“雪澤之無高下”更是經中并未涉及的考證。有增字解經之嫌疑。因為不了解中國遠古的農業生產實踐導致文理不通，遺錯千年。文中多家注釋以為“釋”、“澤”遠古同音、或同義、或通用的考證似無依據。但是“及”確實為“汲”之本字，有兩個發音：sè（入聲，見《說文》及條）和 jí（陽平）。“滌凍塗”的考證亦同此理。

【夏小正原文】初服於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后服其田也。

【夏小正考證】這裏的“公田”是相對於百姓“私田”而言的。這一點可以充分證明夏的公田、私田制度正是西周井田制的濫觴。初就是開年種田之初，服是服侍和服務。初服公田者就是先公田後私田，種好公田之後才能忙於自己的私田。這五個字證明夏代公田私田并行已經是農村村社的一種原始土地制度，它的實行和發展到了西周成為一種成熟的井田制。但是夏代存在公私田制度在其他的先秦文獻中還非常少見。

芡吻合三個特徵。芹菜不是薺菜，因為在《呂氏春秋》的“陽華之薺，雲夢之芹”中將“薺”、“芹”對舉并提，說明它們是兩種不同的蔬菜。若以為是苜蓿，那是缺乏歷史依據的，因為《史記》明確記載苜蓿是由張騫從西域帶回中原的。

【夏小正原文】鞠則見。

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夏小正考證】無獨有偶，《爾雅·釋草》有“鞠，治牆”。郭璞注：“今之秋華菊”。菊為草本，故可以混，也可能沒有上面的“艹”。《爾雅》說其為治牆，說明正月這種用來治牆的鞠和天上的鞠就同時出現了。首先，本節考證初次涉及《夏小正》的天文星象方面的記載，全書每月一條天文星象方面的記載，十一月和十二月空缺。奇怪的是前十個月記載了全部一年時間中的完整的星象。例如：最長的白天在五月，最長的黑夜在十月。按照當今的天象運行規律，這樣的間隔應該是半年即六個月時間跨度，由此可見夏的曆法應該是十月曆法。

其次，夏代的有些星座名稱和今天星座的名稱是不相同的，例如本節中的星座“鞠”便是。

其三，整個《夏小正》的空間定位是以北斗七星來做天穹的中心點的，同時以北斗七星旋轉的斗柄的方向來給季節定位。例如春季二月有“斗柄縣在下”；六月有“初昏斗柄正在上”，這裏的時間跨度是四個多月，當時每月36天的週期所致，有關斗柄的記載應該是二月初

和六月底。初昏是傍晚太陽落山初交黃昏之一瞬。注意星象定位必須與時辰相結合。同樣見於本書有“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鄉。斗柄縣在下則旦”。

歷史上在本節內容的諸多考證中，星宿的名稱就是一個大問題。按照《大戴禮記》應該稱為“鞠”，戴震、鄭康成稱之“嚙”，清儒王聘珍稱之為“朱星”或曰“即蜀”連續，也有稱之為“味”，但是在本質上“即蜀”兩字就是“鞠”或者“朱”字的反切發音。還有些方言的反切發音，其間的方言頗堪玩味。《爾雅》稱之“柳”。以上四個名字中只有“柳”可以在二十八宿中找到柳宿，其餘三個星名都不存在。這個例子很典型地說明我國古代學術考證中在音訓上的一個致命的弱點。但是在夏的方言中“鞠”、“朱”、“嚙”三個字發音是一樣的，都發音為 jü(入聲)。就是說早期夏代方言稱之為 jü(入聲)，夏代以後稱之為柳宿，是二十八宿之一。所以文中的“鞠則見”，就是正月初每天初交黃昏的時候，可以在夜空看見這個叫做鞠星的星宿。《詩經》中“三五在東”就是指這個鞠星。因為柳宿是朱鳥七宿的第三宿。稱呼柳，應該是指朱星所駐蹕的客棧柳宿而言，柳宿一共有八顆星，分為三顆和五顆兩個部分。二十八宿對應地面有不同國家，一個星宿可能對應不止一個國家，這些國家就是二十八宿的分野。

原文中“鞠則見”的“則”在夏方言意為“乍”，就是剛剛開始的意思。表示正月開始在中天可以看見鞠星。

傳疏中的“歲再見爾”意思是一年中可以在相同空

域看見兩次。這兩次的時間間隔應該是夏曆的五個月時間，或者說是周曆的六個月的時間間隔。但天數基本相同。

【夏小正原文】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蓋記時也云。言斗柄，所以著參之中也。

【夏小正考證】凡遠古的天文星象的考證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弄清楚所謂的二十八宿就是行星的客棧，遠古人們把地球赤道和太陽黃道附近的天空大致分成二十八個等分。二是行星在二十八宿的區域內也不是胡亂穿行，而是有其規律的，何時到達某宿，何時到達該宿的中心位置，何時離開該宿的空域都有其規律性。因此某行星到達某宿的時間就非常重要，在既定位置觀察者如果遲到或者早退也是看不到它們的。

原文的“初昏參中”，就是說在正月每天初昏的時候，也就是每天黃昏太陽落下地平綫時，天中央恰好出現參星。傳疏說“蓋記時也雲”，說的是初昏參中記錄的是正月參星出現的大致的時間，也就是春天開始的季節。

夏曆一年是 365 天，也就是說，一年以後黃昏的天穹上又會出現斗柄懸在下的天象。因此古人早就發現天穹是一個球體，太陽從東到西行經 28 宿的位置。斗柄懸在下的位置保持的時間是一年的四分之一時間，即一個季度的時間，亦即 90 天時間。

準確地說，這裏的“斗柄縣在下”中的斗柄是偏向東

北方向的。

北斗的斗柄在一年中在天頂旋轉一圈。斗柄懸在下,就是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下)東北方。這個季節正是春季。斗柄指向東北方正是春季;斗柄指向南方即為夏季;斗柄指向西方即為秋季;斗柄指向北方即為冬季。關於“斗柄縣在下”,何新有所懷疑說:“我疑‘斗柄縣在下’句及傳文,原繫於二月令末句。後為作傳者所竄改也”,這一次何新真的錯了:正月初到三月底是北斗星的斗柄指向東北方轉向東方的時間,表明進入了春季。

春季里,北斗七星位於北天的夜空中央,它由七顆星排列成一個勺子的形狀。它的特點是一年中圍繞著北天的天頂(即北極星)旋轉。注意:按照慣例,勺柄指著南方,叫做“斗柄縣在上”;勺柄指著北,叫做“斗柄縣在下”。因為天子是坐北朝南的,北面在天子的背後。依次可以定斗柄的指向和季節。

《夏小正》原文中正月和二月都有“斗柄縣在下”的記載。說明北斗每天出現的時間是黃昏時分,月份是在春天的正月到三月裏。而“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意謂斗柄此時所指定位正是參星空域的正中位置。初學者容易被指向為東北方的斗柄所誤導而糾纏不清。南北朝的祖沖之、清朝的梅文鼎都曾證明月建和斗柄所指的方向沒有嚴格的對應關係。就是說斗柄的方向只和一年中北斗運行的某一時刻相關。本書中的“斗柄縣在下”也會有飄移,但是斗柄總的指向是固定的。

這些讀音在今後該字訓詁學考證中可能會有。以本節原文為例，梅、杏、柰、桃應該是山上的四種野生水果，但是在諸多的注本中將柰桃合為一種水果解釋，就變成了三種。大戴的傳疏就說“柰桃，山桃也。”其實按照口語或文章慣例，梅、杏、柰、桃應為平行的四種水果。“柰”的音訓可以是“梨”或者“柿”（假借），但遺憾的是梨和柿都不是在正月里開花。梅、杏、柰、桃應該是四種水果。桃和其他三種應該都是水果的大類，如果是桃強調有“柰桃”，那麼其他梅、杏、柰也當有其他的品種需要強調。

原文中“梅、杏、柰、桃則華”，其中的“則”字是“開始”的意思，華字是“開花”的意思。就是梅、杏、柰、桃從正月開始依次開花。但是桃和杏已經不是一月開花而是二月才開花。《禮記·月令》明確記載仲春二月桃始華，且上述水果僅有梅在正月開花。孔穎達疏曰：“《小正》之例，凡言‘則’者，（物）候皆較早也”，這說明孔穎達本人也並不了解夏代十月曆法的有關史實。但是在《夏小正》原文中四月“圃有見杏”，五月“煮梅”，六月“煮桃”以及其他代食品都逐月記載得非常清楚，自然災害之年這些代食品是可以救命的。

這裏我們考證的不僅是正月開花還是二月開花的問題，還涉及到夏王朝的十月曆法問題。按照夏曆的十月曆法，梅、杏、柰、桃都可以在夏曆正月的36天里開花；而按照周曆的十二月曆法，杏和桃就只能在仲春二月的30天里開花。所以《夏小正》含糊其辭地說：“梅、

使之保持受熱均勻。”

正月是夏代建寅之月，孔廣森統計正月經文二十二事，實際上沒有那麼多。立此存檔吧。但是正月的有些農事、物候，現在却是出現在農曆二月。其原因在於夏的曆法是每月 36 天，所以多餘的六天中可能包含的節氣，現代就會出現在下個月初，例如驚蟄。同樣也是這個原因，二十四節氣是逐漸“健全”的。

以上是《夏小正》正月原文和注疏。我們看到很多學者的注疏和《夏小正》原文有些風馬牛不相及。例如僅在正月就有四條：“寒日，滌凍塗”，“鷹則爲鳩”“農及雪澤”，“鷄桴粥”。由於遠古夏王朝早在公元前約 2200 年，孔子編纂《夏小正》在大約前 600 年左右。所以它在民間的口傳時間可能長達數千年。所以當孔子憑藉民間口語的聲音收集整理了《夏小正》時應該是舛誤較多的，尤其是發音、方言和同音假借字方面的錯誤即使是學術大家也不能避免。除了語言方面的錯誤以外，另一個常見錯誤是對民間基層生活風俗、生活現象和自然常識的不了解，也是產生錯誤較多的原因之一。第三點就是當時依據民間口語記錄的名詞和動詞與學者的注疏對不上號。例如“蓼”、“緹縞”、“柎”、“堇”、“繁”究竟是什麼植物，現在依然很難搞清楚。

它們都不是具體的農事內容。

“往”是指農民下地去干農活。“耰黍”就是給即將播種的的黍地鬆土起墒。禪從衣從單。這是一個右文造字：衣是衣服，單是冬季里狩獵的荒地。《說文》：“禪。衣不重(chóng)。從衣單聲”。所以禪是我們俗話“脫單”的意思，就是說脫掉冬衣，穿上單衣。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遠古的文獻中將人類本身的物候記得很清楚，也就是說他們將人本身的物候也列入其中。例如：《夏小正》除了本條正月的禪之外，還有二月的“綏多士女”，八月的“丹鳥羞白鳥”，九月的“王始裘”，《詩經》也有“九月授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等等。人類自身的季節性物候是《夏小正》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是我們今天研究遠古人民生活的重要文獻。但是以往《夏小正》學術研究中，這一門類常常被忽視，或者說它并未受到學者們的重視。

我國的傳統有春捂秋凍的習慣。這裏我們看到其實夏代在二月就開始脫單了。這就是：禪。民間稱之脫衣就功。這裏是告訴大家正月應該穿棉衣禦寒，二月在旱地里干農活的時候就可以脫單了。

【夏小正原文】初俊羔，助厥母粥。

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憂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

誕生了。這是用來交代為什麼有這一段記載的理由，也就是說母羊產羔是仲春的物候之一。下文的“綏多女士”又作“綏多士女”也是將青年男女的春情勃發作為仲春的物候之一。

【夏小正原文】綏多女士。

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夏小正考證】：《夏小正》的口傳者以夏方言為主體，這句話是“標準”的夏方言。綏多相切，其方言為 sěi。這個綏多合音在夏方言中一直使用到今天。用如動詞，常見義為“使用”。環巢湖一帶方言中至今仍常使用。夏代文獻如《夏小正》和《山海經》早先全憑口傳和記憶，代代相傳。口傳歷史的最大優點是發音的準確和內容的準確。這是後世成書以後，其內容出現筆者所說的兩個特點的歷史原因所在。這兩個特點就是同音假借字較多和反切字較多。在我們閱讀夏代的文獻時，凡是兩個字或者兩個以上的字從表面上解釋不通的時候，首先就要考慮它是不是一個反切。例如：

同樣的反切見於《山海經》，《山海經·北次二經》記載：“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請注意這個管涔之山的地理位置：在北次二經南首，其首枕汾。這座山一定不是今天的管涔山。因為《北次二經》的南端起點在晉南，在侯馬市稷山的附近，汾河在這裏由南北向轉為向西流淌，並注入山陝之間的黃河的西河。實際上這是呂梁山的南端起點。

月，令會男女”的意思相同。男女兩情相悅，於是結為連理，嬉戲桑林。這就是《詩經·召南》“有女懷春，吉士誘之”的詩意。上古有“綏多”一詞嗎？我們在黃懷信主撰的《大戴禮記彙校集注》中看見文獻中有兩例，分別是“綏多女士”和“綏多士女”。士是成年的男士，女是成年的女子。但是上古是否有“綏多”一詞，本義上却無從查證。既然本義上沒有，那麼這個“綏多”應該怎樣訓詁呢？這就只能從音訓上去考證。

上古文獻尤其是在夏代的《山海經》中用兩字連用的分音反切注音是常見的。《夏小正》中也多處可見。“綏多”從字面的本義上無法解釋，它們就只能從音訓上加以考證。綏(suǐ)多(yí音移)切 suǐ，夏方言中其音訓為 seǐ。綏多相切在文獻中還可以表示為孳尾切、施尾切、姿肱切和施肱。這其中記錄了遠古的夏方言的發音。切出的長音音值均為兩個字的時長。因使用的是音訓，所以與“綏多”兩個字的本義無關。“綏多女士”在夏方言中是使勁的意思。這也是一種隱晦的說法。這種隱晦的內容一般是不宜明說的，在《夏小正》中還有一處，見“八月……丹鳥羞白鳥”。這些內容一般與人的性生活相關，所以口傳的《夏小正》採用了隱晦的說法。

傳疏“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中的“綏，安也”是一個錯誤的解釋。應取其音訓。其冠子取婦之時也就是說及冠(古者男二十而冠)的男子在這個桑林之會(即春社)上尋女成家。所以在一些《夏小正》的注疏中才有“七月功成”和“霜降而婦功成”的注解，意思是春天

桑林之會(即春社)的成果是在夏曆七月霜降節氣前後成熟。

【夏小正原文】丁亥，萬用入學。

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採也。

【夏小正考證】

丁亥日在周曆中是逢單月的每月二十四，夏曆在前提是十月曆法時情況要複雜一些。所以丁亥日既是單月的日子，就應該在正月。這句原文“丁亥，萬用入學”可能被後來的學者整理錯了。按照夏曆，每一年中第一個丁亥日都是正月二十四，夏曆周曆為同一天。我們可以把“萬用入學”看作是正月二十四的開學儀式。這樣就好理解了。這句正文應表述為“舞干實行入大學”。“舞干”是舞動干戈之意；“實行”是指十五歲孩子開始上大學了。

關於“舞干”的諸多解釋說明學者們並沒有弄明白這兩個字的全部含義。《春秋傳》和《公羊傳》均釋作：“萬者何？干舞也。”其實“干舞”僅僅是一種表意的解釋，它還應該有另一種音義兼表的解釋。其全部的秘密盡在“萬”中，舞干相切正是萬字。所有把萬解釋為干舞的學者們的解釋並沒有錯，但是他們沒有弄清楚“萬”字有義訓和音訓兩重意思。即使是為《夏小正》作傳疏的諸多學者也是效法他人解釋為“萬也者，干戚舞也”，而沒有“萬也者，舞干戚也”。一字之差見學者研究功底和

近訛變所致的訓詁錯誤；“也”字常被誤為“色”；“採”和“菜”為古今通假字；“繁”和“繫”為古今字。其中凡是因聲音產生訛變的屬於早期口傳所致，聲音訛變的居多。凡是因為字形訛變應該屬於文字產生以後的錯誤。即這類錯誤應該發生在孔子或孔子之後，這一點我們在研究中必須細心甄別的。

“榮堇”意謂夏曆二月，一種名為堇的野菜開花（榮）了。皖南的河南移民喜歡在陰曆二月採掘一種名為黃花菜的野菜，因其夏曆二月開黃花故名。其植物學特征與堇比較吻合。這一季候同時也是採摘另一種野菜“繫”的季節。之所以記取兩種野菜，是因為這兩種野菜都是夏曆二月採摘，並可以放在容器豆中供二月有關祭祀時使用。

這裏出現了三種野菜：堇、繫、田胡。天胡，古稱此胡，亦稱柴胡，“……多年生草本，有肥厚的根，莖直立，單葉，倒披針形或廣線披針形，秋季開花，花小，黃色復傘形花序，產於我國各地。”從《辭海》的這個定義看，它可能是中草藥中的柴胡，它“以根入藥，性微寒，味苦。”從訓詁學上看，田胡、此胡、柴胡其發音為一音之轉。我國南北均有分佈且藥用功效相似。我們人類曾經歷過“神農嘗百草”的歷史階段，所以很多蔬菜都是由野生蔬菜經過物競天擇和試吃試種後進入遠古人類的食譜的。但是由於夏代的很多動植物尤其是植物的名稱取自方言發音，今天難以考證。好在有些唐宋以前的考證現在還保留著，例如《大戴禮記·夏小正第四十七》中就保留

尼切。發音遲。《玉篇韻》：蟻卵也。”（以上引自《康熙字典》申集中。）這一節是《夏小正》中最混亂以致難以考證的。原因是諸多字形上有聯繫或者字形相近的字被混淆在一起，導致了內容上的混亂。這些字源自不同的校本：田、由、魂、螺、蟲。但是《夏小正》和《山海經》這類經口傳之後整理編纂的歷史文獻的考證有一個基本的訓詁原則，早期錯誤多由音訓而起，晚期錯誤多由形訛而生。其實準確地說，早期發音逐漸因音訓需要產生較多的輔音導致音節大量產生。

這一節記載的是衆小蟲在驚蟄之後，紛紛開始產卵。文中涉及的“蜺”，《玉篇》所釋的蟻卵，夏代在每年二月製作成蟻（卵）醢用於祭祀。需要解釋的是傳疏中“田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這裏可能正文有脫文。因為不可能在傳疏中無緣無故出現“田魂螺也者”的注釋。但是按照戴校本所增加“魂魂也”三字，似乎與衆小蟲產卵關係更是不大。且二月確實是田螺產卵之時，既然在傳疏中涉及田螺，則正文中有可能脫落。正文的原文如果真有脫落，應為“田魂螺動也。”其後之“小蟲動也”四字當為衍文。

此一記述應該符合田螺的生物習性。田螺在驚蟄之後開始活躍，繼而產出許多細如米粒的小田螺。此一時期，天氣猶寒，在尚未耕作的水田中田螺緩慢移動留下一條長長的軌迹。本節內容通過記載二月昆蟲、蟻卵、田螺等物候，詳細分析了《夏小正》時期的遠古夏人視覺思維規律。這一規律還將運用在下節內容的考證上。

【夏小正原文】來降燕，乃睇（室）。（增“室”字引自王念孫《廣雅疏證》）

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窠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人人內也。

【夏小正考證】這是又一例表明古人視覺思維規律的例證。當時夏人首先看見的是燕子來了。夏人稱燕子叫乙。這是夏方言，“燕”發第四聲：yì。現在環巢湖地區方言仍然這樣發音。來·降·燕，這三個字的次序值得分析一番。遠古之人只知道每年二月燕子從遠方飛來，但是他們并不知道這些燕子來自何處，“莫能見其始出也”，所以用了一個動詞來。但是爲什麼這些燕子到了當地就會降落，而不是降落到其他地方呢？降的目的是乃睇舊室也。降落此地是爲了確認舊年建造的舊室。視覺上先見燕子從遠方飛來，繼而降落在當地，尋找并定居在舊年舊室，最後才看清楚是去年的舊客燕子。如果是新燕，就必須擇宅建新居。這就是遠古之人觀察燕子的視覺特點和思路。這一點和上節所觀察昆蟲和田螺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戴校本的考證較爲合理：“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窠穴謂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內也。”摻、操兩字先秦爲同音字。

初。兩者時間上是吻合的。

在二月一章我們考證了榮莖是一種可供祭祀作豆實的廟菜。《夏小正》中凡“榮字加植物名”多可以解釋為某植物正在開花，而“稊加植物名”多可視作正在結果的過程。

遠古人類為什麼要收穫芸香的原因目前已經失傳很久了。我們只知道芸香有一種特殊的香味，春末夏初開花，花為黃色。採摘的時間為花開以後，果實部分含苞，可知為結果或者結籽的初期。因為原文說“時有見稊”之時。既然不是食用其果實，那便應該是收穫其含苞的嫩莖。至於這種散發香氣的嫩莖的作用，筆者認為首先是用於祭祀。

春季萬物復蘇，野菜極多，例如蒲公英、馬蘭頭、苜蓿、蕨菜、山筍、蒲類、香椿等。植物芸香在《辭海》和植物學相關參考書裏有專門記載。

傳疏總結了《夏小正》記錄植物的計時方法，即以芸香為例，開花為“榮芸”，然後“見稊”，然後“時有見稊”，然後“全部見稊”，然後便是結籽結實。最後是收穫。這就是《夏小正》的物候序時法。

最後我們應該學習一下甲骨文字的卯，卯是柳的本字，其造字的字形是正月柳條的象形。

三、【三月】

三月經文共記載十三件事：參則伏一也，攝桑二也，委楊三也，犂羊四也，蜃則鳴五也，頒冰六也，採蘋七也，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八也，祈麥實九也，越，有小旱十也，田鼠化為鴽十一也，拂桐芭十二也，鳴鳩十三也。

【夏小正原文】參則伏。

伏者，非忘（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雲。

【夏小正考證】相傳《夏小正》是夏代的遺書。這本書幾乎凝聚了夏代人民在生產、生活、宗教上的實用知識。由於夏代是觀察太陽的不同位置來劃定月份的，所以一年只有十個月。這樣在西漢戴德撰疏、大戴禮記時，如果它使用的《夏小正》是孔子整理本或者是其他以夏代口傳為依據的版本，戴氏就必然面臨一個千古難題。這個難題就是夏代每年只有十個月，而商和西周以後每年有十二個月（殷商之後的卜辭中還有十三月和十四月的記載）。十個月的太陽曆和十二個月的太陰曆在歷史上有一個有案可據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就在《詩經·豳風·七月》里。（參見筆者的附文）

《大戴禮記》中的《夏小正第四十七》採用的是十二個月的太陰曆，所以必然也經歷了由每年十個月到每年

頌冰。”可見夏、周時期大夫以上的各個家庭都挖有私家冰窖。

【夏小正原文】採識。

識，草也。

“識”字按照形聲造字法應加“艸”字頭。識，《爾雅》認為是植物黃蔞，《顏氏家訓》認為是黃河以北所產的龍葵，《禮記·月令》認為是苦菜，而《康熙字典》引《本草》認為是苦參，一名苦骨菜。上述植物不是同一種植物，所以上述考證可能是江南江北名稱不同，有些也許就是不同的植物。但是這種叫識的野草有些生物學特征是共同的，就是：小有臭氣，凶年民劇其根食之，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酸菜）。

採識草的作用是什麼？豆實歟？菹食歟？至今已不能解也。

【夏小正原文】妾子始蠶。

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

【夏小正考證】中原的絲綢種植面積曾經相當廣闊，所以南方絲綢經由蘇杭、泉州去往世界各國；北方絲綢經由西安、河西走廊去往歐洲大陸。夏人是養蠶的，他們把三月又稱蠶月。《詩經·豳風·七月》載：“蠶月條桑，取彼斧戕。以伐遠揚，猗彼女桑”。這其實只是養蠶前的準備工作。養蠶自浴種開始，浴種就是將蠶種浸泡在河水中，仿佛是喚醒一個生命。浴種之後才是養蠶

的過程。

“妾子”就是家中的妾，前人對此有諸多考證訓釋。其實，在夏人居住的地區，其方言中兒子單稱兒，女兒又稱女子（音 dǔzī），所以妾稱之為妾子應屬合理。一些學者却人為將妾子分成妾和子，其實是將考證複雜化了。“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其實妾子就是妾的意思，所以《大戴禮記》本條考證似無必要。

《夏小正》的考證有兩個前提必須遵守：一是既是夏人的口傳文獻，就必須以夏方言發音為考證前提。夏的發音可分成兩大主流：雅言和夏方言。二是除了語音以外，語法、詞法、習慣用法、夏方言表達都必須遵守夏人的說話習慣。

【夏小正原文】執養宮事。

執，操也。養，長也。

【夏小正考證】三月的執養宮事就是指養蠶的所有事宜。養宮就是養蠶的蠶室，也叫作蠶宮、旋室，商朝卜辭中稱宣室。養蠶應該避風，所以蠶室是旋轉性的結構，外面的風吹不進去。司馬遷受了宮刑以後在宣室里療養也是這個道理。

【夏小正原文】祈麥實。

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夏小正考證】小麥是五穀中最先成熟登場的農作

物。《夏小正》中的三月和四月有兩點需要仔細區別。一是三月祈麥，四月收麥。例證見於《左傳·隱公三年》：“四月，吳帥師取溫之麥”。這裏的三月四月用的都是夏曆。區別之二是三月小旱，四月大旱。農諺“小滿不滿，沒水洗碗”，小滿前水庫池塘無水是三月常見旱情，但是如果這場旱情持續到四月，便是大旱了（參見《夏小正》四月原文）。夏曆四月大旱相當於今天農曆五月的芒種時節無水可種。祭祀小旱的求雨儀式叫做小雩，祭祀大旱的求雨儀式叫做雩。夏曆四月之後的旱祭稱作大雩帝。方言中，“雩”、“越”發音相通。雩還是一種祈雨的儀式。小雩用於四月之前的小旱，大雩和大雩帝用在四月大旱的祈雨。

原文“祈麥實”常被理解為祈麥，其實這裏的實可以理解為動詞，是充實之意。三月祈禱麥粒飽滿，四月才會有實實在在的收成。所以有“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一說。《夏小正》急於記錄下這個物候，同時也祈禱豐收在望的麥子籽粒飽滿。《禮記·月令》說“季春之月，乃為麥祈實”較為準確。

【夏小正原文】越，有小旱。（原文的正確表達應該是：雩，有小旱。見考證。）

越，於也。記是時恒有小旱。

【夏小正考證】《竹書紀年》云：“禹居冀，故少雨。若南方，則春雨連綿，猶苦其多也。”越，通“雩”。本意是求雨的祭祀，但是這種祭祀是用於三月的小旱，黃河以

北三月的小旱是每年的常見現象，故曰是時恒有。因為常見，所以三月的雩祭只是簡單地用包匭菁茅，以酒淋之。這個小儀式有點類似請人喝酒，不過對象確實天上的“帝”和先行一步在天上的祖先們。鬯酒順菁茅流下，被菁茅吸收，好像是被帝和祖先們已經享用了。

雩的甲骨文上從雨，意為天門；下從於，意為用包匭菁茅瀝酒祭祀，祈雨抗旱。

【夏小正原文】田鼠化為鴽。

鴽，鵪鶉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夏小正考證】注意！本節原文是《夏小正》的一種固定的口語敘述模式。

一月：“鷹則為鳩”；三月：“田鼠化為鴽”；六月：“鷹始摯”（本質是鳩乍為鷹）；八月：“鴽為鼠”，完成一年周期。

這種敘述模式最初通過口語形成，并隨同口語流傳。特點是：同一種動物有兩種形態的轉變，鷹和鳩的相互轉換，田鼠和鴽的相互轉換。其實它們是同一種動物。并非是兩種不同種的動物。這就是神話和科學的本質區別。

轉化週期是五個月，這個時長是夏曆的五個月，實際上是周曆或農曆的六個月，即半年時間。所以這兩組轉變發生在一年中。鷹則為鳩在夏曆五月底完成，所以從夏曆六月開始，鷹開始搏擊長空捕獵；田鼠化為鴽在

夏曆七月底完成，所以夏曆八月鴛開始脫毛并向田鼠形態轉化，并在翌年完成這個生物轉化。所以三月有“田鼠化為鴛”記載。

《夏小正》中有關鴛的物候有一個明顯的錯誤，就是夏曆的三月到八月鼠化為鴛，則夏曆的八月鴛化為鼠應該在翌年的三月結束。但是我們看見《夏小正》中一共有十二個月的物候。在計算年底的十一月十二月以及翌年物候時就遇到了難題。例如八月“鴛為鼠”到翌年三月結束時週期是七個月。但是如果我們用夏曆的十月曆法解釋就容易理解了。

偷吃莊稼田鼠轉化為自食其力的鴛，即鷓鴣，是由惡向善的轉變；鳩轉變為鷹也是由惡向善的轉變。鷹換羽變為鳩是由善向惡的轉變；鴛脫毛轉變為田鼠是由善向惡的轉變。前者叫做變而之善，後者叫做變而之不善。《夏小正》中由善向惡的字數稍多，即“盡其辭”也；由惡向善的字數要簡化一些，即“不盡其辭”也。所謂“盡其辭”和“不盡其辭”之說是《大戴禮記》的一己之見而已。

【夏小正原文】拂桐芭。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夏小正考證】前文已經考證，稊是指植物初發的葉芽。這裏又遇見了植物初結的未成熟的果實叫芭。我國農村自古就有一個習慣：棉花結桃前要抹去多餘的

葉芽以控制其葉子的瘋長；浙閩一代的楊梅要分期採摘才能保證每一次都完全成熟；桃樹和獼猴桃初結果時要摘掉幼桃較密處、濃陰下的“發育不良”的果實以及僵果，以便果實大小均勻；此處“拂桐芭”則是指的是一種經濟作物油桐樹結的果實，在油桐樹初結果實時，確保油桐樹上結出較大的且出油率較高的果實。油桐樹所結的果實的用途主要是壓榨桐油，而桐油作為日用品的用處則是用於塗抹木器和家具，木船防腐、防水、防漏也是使用桐油來塗抹。“拂桐芭”在各種注本中還有另一種訓解為油桐樹開花之時，即上文傳疏所說的“貌拂拂然也”。此時開始生長出桐芭。如果桐芭結得過密則需要抹去幾個使之疏密得當。所以很多學者將油桐樹釋為梧桐是完全錯誤的。夏曆三月梧桐并無開花結果的生理現象，而夏曆三月却正是油桐開始開花的季節。所以將這類的油桐樹附會為梧桐是完全錯誤的。

【夏小正原文】鳴鳩。

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后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夏小正考證】“相命”即是相互呼喚之意。“鳴鳩”意謂每年三月野外的斑鳩開始互相以叫聲呼喚配偶。這裏斑鳩的叫聲，實際上反映了遠古之人觀察自然的方法。飛鳥是很難被直接觀察到的，所以古人就憑藉著鳥的叫聲來區別不同的鳥類。

也許是古人對鳥的分辨能力尚弱，遠古之時鳥的種

類流傳甚多，尤其是鳩和雉。《說文》載雉有十四種，且東南西北名稱各不相同。但鳥兒依聲得名是一個常用方法：“精衛填海”又是一例。

即房星，陝北人以辰星與日俱出俱入。以九月辰星出可以鑿窯，以四月辰星消隱停止鑿窯。辰是二十八宿房宿四星中最亮的一顆，夏商時期人們用它標誌農事。因為冬季鑿窯的結束之時正是春季農事開始的季節，即每當夏三月商四月辰星出現時，便是停止鑿窯（建房）開始農耕的時節。同樣在九月“辰繫於日”時意味著農事的基本結束和鑿窯季的開始。所以辰星又稱為房星。是房星的代表性的星座，民間總是以最明顯、最活躍的星作為整個星座的代表。

“辰繫於日”意謂房宿四星早晨和初生的太陽俱出俱入。也就是孔廣森所說的“九月日躔大火”，東方青龍七宿之“龍尾伏辰，房在日前，如繫之然”。

【夏小正原文】雀入於海為蛤。

蓋有矣，非常人也。

【夏小正考證】《說文》云：“雀，小鳥也。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雀可以通“爵”。“海”在這裏指的是大水。遠古的四海都是湖泊和大澤，而不是鹹水湖或者今天意義的海洋。雀是不入鹹水的。“雀入於海為蛤”是遠古人觀察事物過程中發生的一個錯誤。每年秋天雀在江湖中洗滌，人們會下水捕捉。人們會捕捉到什麼呢？他們當然捕捉不到雀，他們能捕捉到的只是蛤。看見的是雀入水，捕捉到的却是蛤。這就是人們認識上的一個錯誤。人類早期原始思維中這樣的簡單思維比比皆是。

《大戴禮記》的傳疏者也沒有考證出結果，而只是懷疑。說這樣的情況大概是有的，但是只是一種偶然，而不是一種經常性的現象。但是偶然現象是不能記入《夏小正》的，《夏小正》記錄的是每年週期性出現的星象和代表性物候。所以傳疏中是探詢語氣。其實，我們查閱《夏小正》就會發現，這個現象一定是經得起歷史考驗並且是週期性的“自然現象”，《夏小正》正是夏代勞動人民堅持觀察自然的經驗性總結。事實上，《夏小正》的許多有經無傳處多數都超出了各代學者的知識結構、考證水平和生活經驗了。

十、【十月】

十月經文記載了七件事：豺祭獸一也，初昏南門見二也，黑鳥浴三也，時有養夜四也，玄雉入於淮爲蜃六也，織女正北鄉則旦七也。

【夏小正原文】豺祭獸。

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月令》孔疏：“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皆殺而不祭也。”

【夏小正考證】夏曆的十月已是一年的年底。以周曆計算相當於11月25日到12月30日。但是奇怪的是該書依然有十一月和十二月的記載，只是缺少了天象。筆者以爲：十月記載了六件事：豺祭獸一也，初昏南門見二也^①，黑鳥浴三也，時有養夜四也，玄雉入於淮爲蜃五也，織女正北嚮則旦六也。類似獺祭魚和豺祭獸的對動物行爲的解釋，也應該是夏代人的主觀臆斷。《禮記·月令》：“豺乃祭獸戮禽”。類似物候《夏小正》全書兩處見之：一是一月獺祭魚，意謂水獺將開春后初獲的

① 初昏與南門雙星同現於黃昏時的夜空，故二、三合併爲二也。

魚環水邊祭祀，此後捕獲的魚才食用。二是十月豺祭獸，將初獲的野獸祭祀給上天，此後捕捉的野獸才用於食用或冬藏。夏曆的一月和十月連續兩個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水獺和豺狼的此舉是否爲了儲藏食物呢？夏人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觀將此舉理解爲獻祭的。但其實豺狼是不冬眠的，所以它們需要儲藏大量的過冬的食物，此舉被人類理解爲豺狼獻祭。其實《夏小正》中屢次出現記載九月、十月氣象和物候均以十月的冬至爲標準。足見夏代冬至節在生產、戰爭、祭祀生活中的重要。以周曆爲曆法的“豺祭獸”是安置在周曆的九月末十月初，和豺祭獸的日子基本不變。

讀者務必要了解在夏代時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四節氣的（參見 22 頁表），在該表中夏曆十個月每月爲 36 天。每年的年底即夏曆十月的最后一天是農曆的臘月三十。隨後是五天的狂歡，見於《詩經·豳風·七月》所載。

【夏小正原文】初昏南門見。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參見本書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

【夏小正考證】清代無錫學者嵇承謙考證：十月的早晨，南門（星名）見於天之東南角，而不是初昏（傍晚）。所以“初昏”疑爲“初旦”或者“初朝”。夏民間送禮有“三朝”之說，意謂孩子出生後的第三天上午。學者王聘珍的意見很有道理，他認爲此處爲“經傳文有訛變。十月

初昏，南門伏，非見也”。就是說南門亢宿的雙星四月見面，至十月初昏就隱而不見了。則此處的“再見”是指翌年四月再次見面。這個問題在夏商十月曆法的天象被確定以後，才會有正確的結論。

【夏小正原文】黑鳥浴。

黑鳥者何也？鳥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夏小正考證】多數學者認為此處的黑鳥就是燕子。夏曆九月（周曆十月）是燕子集中回遷南方過冬的時節。燕子在秋風中上下翻飛，然後向南飛去。翌年三月，它們會從南方返回舊地。關於黑鳥浴的浴字，有學者將其解釋為育雛之育，不妥，十月不是燕子的繁育季節，也不是多數鳥禽的繁育季節。黑鳥浴，也說明黑鳥（烏鴉）戲水是常見物徵。廣東潮州音樂有一首《寒鴉戲水》，是用古箏表現的。但本月的“黑鳥浴”和“玄雉入淮為蜃”和“雀入於海為蛤”，雖是三種不同的鳥入寒水，但需要強調的所指是不同的。九月是雀入於海為蛤，十月是黑鳥入水洗浴，十月底玄雉入淮為蜃。這是本書記載容易產生混淆的地方。

【夏小正原文】時有養者（夜）。

養，長也，若曰之長也。

【夏小正考證】原文“者”應為“夜”，“曰”應為“日”。孔廣森讀“若日之長也”為“若日久長也”，有理，可信。“久”字為“之”字的形訛，形訛是口傳歷史在有了文字載

體之後以訛傳訛所致，此前則多是音訓上的錯誤。養日、長日、永日不僅音訓相通，意義上也是相通的。兩處的“長”字均音訓爲 cháng。

十月有“養夜”是和五月的“有養日”相對應的。養日就是長日，是一年中最長的白天，也就是夏至日。養夜則是一年中最長的黑夜，也就是冬至夜。夏曆一年是365天，但是我們發現五月的夏至日和十月的冬至夜應該相差180天，但是在《夏小正》中僅僅相差五個月。問題在於新的一年的冬至到夏至會是七個月嗎？當然不是。所以據此可以判斷夏曆是十個月曆法，每個月就是36天，所以半年是180天。確立這一點對我國遠古文獻的考證帶來了極大的說服力。這裏的夏至和冬至間隔爲五個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夏小正原文】玄雉入於淮爲蜃。

蜃者，蒲盧也。

【夏小正考證】蜃，同“蜃”。清朝學者的著作中常避玄雉名諱以“元”代“玄”。關於蒲盧的兩種解釋見於《山海經》郭璞注。郭引《爾雅》曰：“蒲盧者，螟蛉也。”畢沅曰：“郭說非也。蒲盧者蜃是。”結合本文本義，涉及蒲盧者均應爲淮河中的淡水蜃，即河蚌，民間俗稱水菜是也。玄雉是野雞的一種，據《說文·雉》記載兩漢前有14種雉。但是每年十月野雉入淮爲什麼就變成蜃了呢？學者何新認爲“舊說野雞入淮水變蛟蜃，不可解，疑”。其實是何新先生沒有搞清楚其中的道理。同樣的

記載見於《淮南子·時訓解》冬至又十日，“雉入水，化爲蜃”，來自劉安之前民間的口頭流傳。

這是源於遠古人認識上的低下。同樣的誤解還見於《精衛填海》。其原因在於遠古人類認識能力是逐漸進步的。當他們在大海尋找被溺死的精衛時看見波浪中飛出的海燕，當他們在淮河中尋找鑽入水中的玄雉時下水捕獲的却是蜃（河蚌），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爲玄雉入淮化爲河蚌。他們就認爲“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同樣的例子還有《女媧補天》等。

【夏小正原文】織女正北鄉則旦。

織女，星名也。

【夏小正考證】戴校本及多家作“織女正北鄉則旦”，此訓可信。另一種考證是去除了“則旦”二字，爲“織女正北鄉”。也不影響訓詁學的理解，但是以戴說最接近本義。

這裏又遇到一個令人費解的學術問題：關於“織女正北鄉，則旦。”《夏小正》記載十月織女正北鄉，但是後世學者有不同意見。例如清朝學者王聘珍考證認爲：“織女三星……十月中後，旦刻見於東北方。”正北方和東北方相差達 45 度之多，《夏小正》十月的正北方向爲什麼會被學者們考證爲向東北 45 度？我認爲差別的原因就在於夏曆和周曆的不同。周承夏制，夏曆十月相當於今天農曆的十一月二十五到年底，在此期間織女會出現正北鄉。但是孔廣森、王聘珍考證的十月天象中織女

三星的位置在周曆早已經離開正北位置，已然移往東北。所以只有在早晨交旦時刻見於天穹的東北方向，這是周曆十二月的天象。

十一、【十一月】

十一月經文記載了共五件事：王狩一也，陳筋革二也，嗇人不從三也，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四也，隕麋角五也。

【夏小正考證】由於曆法的特殊性，夏曆沒有十一月，《禮記·月令》周曆記作仲冬之月。周曆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對應的是夏曆的九月和十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時節。《夏小正》的十一月和十二月沒有天象記載，九月和十一月有王的記載。這是它們與其他十個月考證的質的區別。流行至今的《夏小正》的十一月經文凡五事：王狩一也、陳筋革二也、嗇人不從三也、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四也、隕麋角五也。從十一月前三件事的內在邏輯分析，原文次序似乎有問題。筆者的見解傳疏當是：十一月，陳筋革一也，王狩二也，嗇人不從三也，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四也，隕麋角五也。

從夏曆轉為周曆，即從十月太陽曆法轉為十二月太陰曆法。《詩經·豳風·七月》里關於周曆的陽轉陰記錄的比較詳細和透徹。但是在《夏小正》中夏曆的陽轉陰尚未完成，《夏小正》的曆法很明顯是十月曆法，每月36天。夏至到冬至也是五個月，每月是36天。夏人在《山海經》中記錄了東海的十座日月所出的山，每天一個太陽從山間升起來，這樣從西到東，然後是從東到西正

好是一年時間。這是夏代太陽曆的最早的記載。

【夏小正原文】陳筋革。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夏小正考證】兩處均為“陳筋革”，“肋”為“筋”之初文。王在陳筋革之後，取兵甲之善者展示於眾也。《大戴禮記》引《玉篇》：“陳，列也”。《爾雅·釋詁》曰：“省，察也”。革，獸之皮也。筋，所以為弓弦也。兵甲，兵器甲冑也。筆者以為“陳筋革”可以在“王狩”之前，也可以在“王狩”之後。因為這裏的兵甲都是當年製造的，所以“省察”在“王狩”之前也是符合常理的。

【夏小正原文】王狩。

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為狩。

【夏小正考證】“王狩”意謂夏王按照季節出獵。十一月是夏王冬獵的常規季節。狩字的甲骨文從獸從干，這是一個右文造字，獸既是聲符也是義符，狩字的本義是蹲守陷阱以獲野獸（甲 3599）。

【夏小正原文】嗇人不從。

不從者，弗行。

【夏小正考證】嗇字最早見於卜辭：

卜辭：“貞，乎逐在嗇，鹿獲。”（乙 3431）

卜辭：“貞，翊庚申，王令獲鹿於嗇。”（乙 6235）

卜辭：“庚戌卜，王乎嗇射虎……獲。”（鐵 242·2）

甲骨文“嗇”通“穡”，嗇夫即穡夫，就是種莊稼的農夫。“嗇”的本義應該是打穀場較為合理，打穀場或者莊稼地會引來野獸。所以冬季成為了獵場。但是當它與“人”或者“夫”結合，其含義就變成了出苦力，跑腿者等勞役。《管子·君臣上》曰：“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就是說小吏打雜什麼事都干，勞役則什麼事都可以叫他去做。嗇夫一職的設置是西漢在西域的事情。

原文“嗇人不從”就是十一月的王狩沒有以往的前呼後擁的陣仗，而是王輕裝簡從去獵場打獵。這裏的王可能是商王而非夏王。因為夏曆是十月曆法，而這裏的十一月凡五事或者十二月的凡五事可能是商人的完善和補充。又因為這部分內容涉及到的多是王、冬季狩獵、捕魚和調教牲畜，這些都和商朝冬季事物有密切聯繫。

【夏小正原文】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本條無傳疏。

【夏小正考證】但上述八個字是否《夏小正》原文，却受到清代學者戴震及弟子孔廣森的質疑，認為它們應屬於《夏小正》的原文，並力主“升此八字為經”。原文中“時”通“是”，“於時月也”就是“於是月也”，即十一月。這種文法與《夏小正》一經的文法實不相似。^① 前者記載的是物候，本原文論的是道理。

“萬物不通”是周曆十一月的物候。即天地閉藏，萬

^① 黃懷信注，大戴禮記彙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物不通之時。此時正是陰氣收斂、陽氣未動之時。戴震以此統解上文十一月的“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是片面的，此處的“萬物不通”是指陰陽、天地間萬物皆不通。即《易》之否卦之“上九、傾否，先否後喜”。喜從何來？否極而泰來也。

【夏小正原文】隕麋角。

隕，墜也。曰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夏小正考證】《說文》：“麋，鹿屬也，以冬至時而解角也。”《月令》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日短至”即冬至，“陰陽爭”即陽氣始動。“向生”謂自然界生命初起的芸芸眾生。“皆蒙蒙符矣”，意謂因為陽氣萌動而出現的生命徵兆。既有陽氣之始動，就必先有陰氣之衰微，亦即萬物不通的過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就應該屬於《夏小正》的原文。《夏小正》因為世代口傳，在其後的商、西周、東周、秦、兩漢時期補充、變化很大，尤其是在周初曆法對夏代的曆法改變較大，使後來的《夏小正》的考證錯訛更多。僅就冬至一點的考證而言，當時尚且未見系統的二十四節氣的記載，但夏曆的冬至時值夏曆十月初，而周曆的冬至則是在周曆的十一月十二月之交。兩者的時間差別長達30天，所以就出現了《夏小正》記載了十一月和十二月兩次麋隕角，這兩次“麋隕角”在筆者看來都是符合科學道理的。（參見《夏小正》十二月之“麋隕角”考證。）

十二、【十二月】

十二月經共記載了五件事：鳴弋一也，玄駒賁二也，納卵蓀三也，虞人入梁四也，隕麋角五也。

【夏小正原文】鳴弋。

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夏小正考證】孔廣森曰：“弋，未聞。”孔廣森之所以未聞，是因為孔氏是曲阜人。如果他是伊洛平原、河南固始、光山一帶、湖北內方地區，或者環巢湖地區的人，他就會領悟這一片廣闊的地區自古以來的方言“弋”就是燕(yì)。而十二月正是燕子飛往南方過冬的時節。《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疾。”“鳴燕”首先是它們的鳴叫聲吸引了人們，於是人們看見燕子已經正在向南遷，燕子南飛這一物候又告訴我們已是季冬時節，一年就要結束了。

但是這裏的“弋”也可以理解為大雁的雁，所謂長空雁叫。此時正是周曆的十二月，是大雁北飛的季節。恰巧在夏的方言中“燕”和“雁”的發音是相同的。但是在語言習慣上，燕稱為燕子，而雁稱為大雁。而環巢湖地區和湖北內方地區的方言均稱為“弋”。

方言是研究某地遠古史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因

爲遠古中國人們都是用方言表達和交流的。但是，由於千百年來口傳的過程中，書面研究的過程中不同的作者操持不同的方言參與研究，以致即使同一句話甚至同一個字在遠古史文獻中的發音都不盡相同。所以，及時挽救各地方言就成爲當務之急。方言在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中也是逐漸走向定型的，即使這個過程因爲方言的保守性表現的非常緩慢，成百上千年內看不出什麼變化。

【夏小正原文】玄駒賁。

玄駒也者，蟷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

【夏小正考證】清朝學者避玄燁名諱，稱元駒爲玄駒，也有版本不稱玄駒直稱駒的。對“元駒賁”中“元駒”，有兩種主流觀點：其一認爲係指當年春天受孕產下的馬駒，此時八個月大，正是奔跑之時。參見【夏小正原文】四月……執陟攻駒。賁同“奔”。此說有理。其二是清朝學者王聘珍從中國陰陽文化角度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證。“王聘珍曰：‘《爾雅》曰：‘蚺蜉，大蟷，小者蟷。’《方言》云：‘蚺蜉，齊魯之間謂之蚺蜉，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蚺。’傳云賁字之意爲“走於地中”，意思是陰陽之交螞蟻已然從蟄居中醒來，是陽氣已經從蟄居中萌動。

這是一年中的陰陽之交。即使在十二月地下的螞蟻已然醒來。

【夏小正原文】納卵蓀。

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夏小正考證】蒜，俗蒜字。見《干祿字書》。“納卵蒜”是向王室進貢卵蒜之意。卵蒜是當時一個古老的蒜種。本是指植物的根莖。“本如卵者也”，意謂這種大蒜的根如同鷄卵，故稱之卵蒜，又稱獨蒜。這種卵蒜我國農村又稱之獨蒜，至今也還有栽培。這種獨蒜和小蒜、野蒜、野蔥、小蔥都不是一個品種，但是外形上較像。《抱樸子》云：“夏后氏始食卵”。這裏的卵應該就是卵蒜，因為中國人使用鳥卵和禽卵的歷史要比食用卵蒜早上幾千年之久。

【夏小正原文】虞人入梁。

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

【夏小正考證】“虞人入梁”意謂大寒到了，虞人這個官員就要到河塘捕捉水鮮以供王室。為什麼選擇在大寒時節呢？因為此時土蟄的水鮮已經醒來。時間上年終的狂歡已經到了。

“梁”在甲骨文中寫作“良”，其字形為一條彎曲的魚梁水壩，中段嵌進一個捕魚用的竹筍，有時是一隻漁網。總之就是在大寒之後在魚梁壩上挖一個缺口嵌入捕魚工具，魚進去了就出不來。所以《詩經》有雲：“敝筍在梁”指此。夏代的虞人不是官職只是工種而已，周朝設有官職叫做“敝人”，掌以時敝為梁。孔廣森有注曰：“蔡德晉曰‘虞人，澤虞也。入梁始漁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是也。’”故敝人俗稱為漁師。

【夏小正原文】隕麋角。

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

【夏小正考證】

“隕麋角”的十一月的傳疏是：“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隕麋角”的十二月的傳疏是：“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

《夏小正原文》分別在十一月和十二月兩次記錄了“隕麋角”。“隕麋角”，是指每年的十一月冬至節麋鹿就開始脫落自己的角，到了十二月底麋鹿還在脫落自己的角。這就使“隕麋角”這一物候變得費解。

為什麼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兩次提到“隕麋角”呢？這兩次隕角又有什麼不同呢？《說文》曰：“睹，旦明也，從日者聲”然而在十二月季冬又出現了“隕麋角”的記載，這又是什麼原因呢？上述《說文》有關“睹”字在字形上很容易和另一個漢字“睹”相混淆。結合兩次提及的上述“隕麋角”的傳疏，其訓詁就變得明朗化了。

麋群們每年的隕麋角始於冬至，終於年末，是一個持續一個月左右的生長過程。當十一月初次看見“隕麋角”時，正是冬至。冬至是一年中陽氣初顯的時間點。民間有“冬至一陽生”，“吃了冬至面，一天長一綫”的農諺。《夏小正》的物候隕麋角是為了記住冬至一陽生的時間。這一隕麋角的過程從冬至直到十二月大寒結束。

既是十一月已經有了記錄，十二月是不是多餘？不是！記錄十二月“隕麋角”這一物候的不同意義見於十

二月的《夏小正傳疏》：“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就是說起於冬至的一絲陽氣，到了十二月底已經可以明確地感受到。因為此時的陽氣已經在早晨太陽升起時就可以明確看見或者感覺到，所以在《夏小正》中明確記之這一物候。

上述做法在《夏小正》原文中不是唯一的，所以有學者認定《夏小正》原文中兩次出現“隕麋角”屬於衍文的觀點是沒有說服力的。研究《夏小正》的清朝學者注意到原文中十二月有“鷄始乳”的記載，同樣在《夏小正》原文中一月有“鷄桴粥”的記載。這兩個有關鷄的物候應該“鷄始乳”在先，“鷄桴粥”在後。鷄不是哺乳動物，所以“鷄始乳”就是抱窩的母雞開始為孵化小雞而生蛋，並積累到一定的數量，這個數量一般是 20 枚左右的雞蛋為一窩。“鷄桴粥”即“鷄孵雛”，大約在翌年一月，雛雞破殼而出。所以在《夏小正》原文中“鷄桴粥”在先，而“鷄始乳”在後。由於這個次序上的誤解，很多學者刪除了位於十二月的“鷄始乳”，筆者認為此處應予以還原。

參考文獻

-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1988.
- (漢)劉熙.釋名附音序.筆書索引.北京:中華書局,2016.
- 諸子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 (清)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 黃懷信,孔德立,周海生.大戴禮記彙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 (清)王念孫注.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
- 蔣立甫.詩經選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 陳宏天,呂嵐.詩經索引.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
- 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清)胡謂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清)阮元.經籍纂詁.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馬驥撰,王利器整理.驛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北魏)酈道元注.水經注.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 姚淦銘,王燕.王國維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
- 聞一多.伏羲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徐無聞.甲金篆隸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1.
- 王宇信,韓江蘇.甲骨文精粹釋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
- 黃侃著,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北宋)沈括撰,李群注釋.夢溪筆談選讀(自然科學部分).北京:

科學出版社,1975.

顧頡剛. 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 北京:中華書局,1988.

呂思勉. 先秦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晉)郭璞注. 山海經.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郭郭注. 山海經注證. 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04.

(宋)朱熹. 楚辭集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黃侃,黃焯輯. 爾雅音訓. 北京:中華書局,2007.

華強. 殷商甲骨文本訓. 合肥:黃山書社,2014.

華強. 甲骨文比較研究.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華強. 漢字造字進化論.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周祖謨. 方言校箋. 北京:中華書局 1993.

馬如森. 殷墟甲骨學:帶你走進甲骨文的世界. 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

劉夢溪.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董作賓卷.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何新. 龍:神話與真相. 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何新. 宇宙的起源——〈楚帛書〉與〈夏小正〉新考. 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

何新. 諸神的起源. 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07.

蒙文通. 中國古代民族史講義.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郭沫若.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侯外廬. 中國古代社會史論.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齊思和. 中國史探研.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李學勤.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 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05.

張政烺. 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2012.

趙誠. 古代文字音韻論文集. 北京:中華書局 1991.

王力. 漢語語音史.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紹榮芬. 切韻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唐作藩. 上古音手冊(增訂本). 北京: 中華書局, 2013.
- 楊懷源. 西周金文詞彙研究. 成都: 巴蜀書社, 2007.
- [美] 布隆菲爾德. 語言論.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0.
- [美] 愛德華·隆丕爾. 語言論.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5.
- [瑞士] 索緒爾. 普通語言學教程.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0.
- [美] 霍凱特. 現代語言學教程. 北京: 北大出版社, 1986.
- [法] 列維·布留爾. 原始思維.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1.
- 一個理科學者的思考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aqiang>
2009.

責任編輯 葉兆愷
張楚武
裝幀設計 馮 勁

夏
正
新考證



出版社天貓官方旗艦店

ISBN 978-7-5337-7825-5



9 787533 778255 >

定價：30.00元